

中国教育大家

陶行知，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

陶行知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并一生积极推动平民教育运动。他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其中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唐澜波 主编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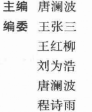


中国教育大家

万世师表·孔　子
学界泰斗·蔡元培
教育师尊·徐特立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爱国教育家·张伯苓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韩闻锦　封面设计／马重慧





中国教育大家

主编 唐澜波
编委 王张三
王红柳
刘为浩
唐澜波
程诗雨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

武汉大学出版社
WUHA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平民教育家·陶行知/唐澜波主编.—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9
中国教育大家
ISBN 978-7-307-10177-7

Ⅰ.平…　Ⅱ.唐…　Ⅲ.陶行知(1891~1946)—传记
Ⅳ.K825.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08488 号

责任编辑:聂勇军　　责任校对:黄添生　　版式设计:韩闻锦

出版发行:**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wdp4@whu.edu.cn 网址:www.wdp.com.cn)
印刷:湖北恒泰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950×1260　1/16　印张:8.5　字数:84 千字
版次:2012 年 9 月第 1 版　　201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10177-7/K·585　　定价:14.00 元



陶行知，1891 年生，安徽歙县人，原名文濬，后改知行，又改行知。中国人民教育家、思想家，伟大的民主主义战士，爱国者，是中国人民救国会和中国民主同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陶行知少时毕业于金陵大学文学系，后留学美国，曾跟从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学习。

陶行知生活的年代，正值中国处于危难之际，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的陶行知，亲眼见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劳动人民特别是占中国人口 80% 以上的农民们过着贫穷、愚昧、落后和受压迫、受欺凌的悲惨生活，这些重重地刺激着陶行知那颗忧国忧民之心。

陶行知最早注意到乡村教育问题，并一生积极推动平民教育运动。他先后创办晓庄学校、生活教育社、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

和社会大学。陶先生一生办过许多种类型的学校，这些学校为社会培育了大批有用人才，还输送了不少革命青年到延安和大别山抗日根据地参加革命。

他宣传生活教育，提倡“教学做合一”及“小先生制”，要求教育与实际相结合，为人民大众服务，并提出了“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三大主张，其中生活教育理论是陶行知教育思想的理论核心。

陶行知的教育活动是在当时民族危亡、国难当头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因此他的教育实践是与民主爱国的活动相伴而行的。早年他曾投身于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中，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并参与发起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组织国难教育社等。

1946年7月25日上午，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加之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不幸逝世于上海，享年55岁。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均赶往探视，并送挽联予以哀悼。

陶行知先生教育著作主要有：《中国教育改造》、《古庙敲钟录》、《斋夫自由谈》、《行知书信》、《行知诗歌集》等。

总　序

法国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卢梭说："人的教育在他出生的时候就开始了，在他不会说话和听别人说话以前，他已经就受到教育了。"的确，从广义上讲，教育活动每时每刻都和我们相随，其教育成果恩惠于你我每一个人。而狭义上的教育则特指我们在学校所接受的教育。在一定意义上，狭义的教育是我们获取知识的最好来源，所以，我们习惯上把狭义教育称作教育。

教育活动需要有好的老师。自人类有教育以来，人们取得的荣誉和成就，当首先归功于教书育人的伟大的教师。《礼记》有言："师也者，教之以事而喻诸德也。"韩愈说："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教育工作是项伟大而神圣的事业，成功的教育培育一代代英才，而愚昧落后的教育方式，只能误人子弟，培养出庸才来。正是这个原因，无数教育者无私奉献，探索最好的教育方式，甘为孺子牛般默默无闻地为学生奉献着一切。

教育的成功有着超远的意义，古代中华文明的崛起和兴盛更是离不开诸多先贤的教育努力。相传孔子弟子

三千，名者七十二，《论语》就是其教诲弟子的传世教育经典佳作；庄子、墨子、孟子等莫不是弟子众多，传世著作则收藏着他们辉煌灿烂的教育思想。圣贤们言传身教，推动着中华文明之花绚烂绽放。近代的教育家更是毫不逊色于先贤，他们在动荡的时局中把对祖国的救亡图存和民族振兴的重任扛在肩头，倾尽心力教书育人，启发亿万学子的爱国热情，直接推动了中华民族抵御侵略和独裁的伟大斗争，他们是近代史上最为值得尊敬的导师！

本套丛书所选的五位教育家，他们或启人心智，传授仁义于四海，成为万世师表；或参加革命，拯救万民，而后投身教育的改革，打破长久以来的僵滞教学模式；或亲近民众，独创融入群众的教育组织，为最底层的学子提供教育；或穷尽一生努力办学，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表现出一个真正教育家的高风亮节；或一生致力于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一代师尊。这些人已经被历史铭记，成为后来为师者敬重的榜样。他们的坎坷经历、教育思想以及取得的成就，给现在的教育工作者以启迪。走进他们的世界，让我们读懂了教育家的精髓：奉献于教育，痴迷于教育，坚守于教育，创造于教育！有了这些元素，教育家才有底气，有灵气，有勇气，有智慧。走进他们的世界，我们读懂了：教育家，犹如教育原野里葱茏繁茂的大树，她的根，应该始终扎在校园生活的沃土里；她的枝叶，应该始终庇荫着学生

心灵的天空。走进他们的世界，我们知道了对于“中国迫切需要什么样的教育家”这个问题，我们寻求到了答案……我们迫切需要的是他们的这种精神，教育家的献身精神。这样的教育家多了，我们才可以真正改变中国的教育面貌！

诚然，中国的杰出教育者绝非仅此五位，但这五位教育家各具特色，用各自的方式在中国的教育文化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读者朋友们不仅能从这些教育大家身上学到各种先进的教育方法，更能从他们的经历中收获人生的大智慧。能够有机会通过文字的形式，聆听大师的声音，提升自己的心灵。这也是我们出版本套丛书的目的之所在。

本套丛书虽然倾注了作者的一腔热情，但难免会有疏漏及不足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朋友在阅读之余，能够谅解并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编　者

2012 年 9 月



目
录



安徽省歙县西乡黄潭源村，旧时属于徽州府范畴，那里自古以来人文荟萃，是徽州文化的发源地。然而，群峰参天、岭谷交错的秀美黄山和飘逸苍茫的云海交织出的醉人景色并不能让当地的人们吃饱饭。19 世纪末，这里仍是一片山多地少的贫瘠之地，大多数家庭全年的粮食仅够吃三个月，所以，当地人大多背井离乡，外出经商谋生。

1891 年，在那个暑气还很猖獗的秋天，一个男孩呱呱坠地，他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这个小孩的到来给家庭带来了很大的喜悦，但是，谁也不会想到，他以后会成为名垂千古的教育大家——陶行知。

陶行知的父亲吧嗒吧嗒地吸着大烟，思量后，说："这孩子的姐姐宝珠那么小就夭折了，咱们陶家人丁不兴旺呀，都说庙里的菩萨福慧圆满，不如让这孩子沾点佛家的福荫，就叫'小和尚'吧，以求庇护。"

家里人都认为这个小名起得好。这个"小和尚"外表看起来还真有点"名如其人"：他宽宽的额角，细长的眼睛，鼻梁儿挺高，五官长得周正、斯文，头也总是被母亲剃得光光的。原来，母亲治家非常勤俭，为了节省家用，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几十年以来她都亲自"操刀"，把家中丈夫、子女的头理得有模有样。那把刀已用过三代，所以有"一把剃刀剃三代"的说法。陶行知后来长大成人后，一直把母亲用过的剃刀视为传家宝小心珍藏，母亲逝世后，他还特地写了一首诗："这把刀！曾剃三代头，细数省下钱，换得两担油。"

陶行知的父亲曾经也读过书，是个厚道人，原来在休宁县万安镇经营一家酱园。鸦片战争之后，帝国主义列强的铁蹄将祖国践踏得山河破碎，同时所带来的洋货倾销，也使本就不发达的农村经济越发萧条，无奈之下父亲只好将酱园盘给亲戚，自己回家乡继续种田务农，靠卖柴卖菜养活一家人。母亲除了和父亲一样每日干农活、操持家务外，还做女佣替人缝补浆洗，日子过得非常艰辛。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陶行知从小就知道为家里分担家务，长大后，他和奶奶一起搓麻线，跟母亲一起种菜，随父亲砍柴、卖柴和卖菜。作为劳苦大众的一员，他深切地体会到底层农民的疾苦。

陶行知小时候非常聪明。大人们回忆说，他五岁时就总是趴在地上，有模有样地对着人家厅堂的对联描字儿。蒙馆的方秀才听说这个事情后，好几次上门劝说陶行知的父母：

“你家‘小和尚’是个读书苗子，又这么好学，趁早送他入私塾吧，别耽搁了孩子的前途。”

陶家父母听后心如刀绞，谁不巴望家中唯一的男孩子有出息呢？可是家境如此贫寒，一家老小拼尽全力才能够勉强糊口，哪来的钱送儿子入私塾读书？方秀才见陶行知父母每回都是面有难色，知道他家的实际情况，也许是爱才心切，他终于松口说道：

“我不收拜师费，免费教你家孩子识字吧！”

自此，陶行知有了学名：陶文濬。陶行知父亲曾经读过书，于是晚上收工后亲自教他背诵《左传》，陶行知 45 分钟内就能背诵 43 行。每个晚上，母亲在油灯下做针线活，儿子则在一旁写字，琅琅的读书声不时响起，仿佛点燃了全家人的希望。

陶行知很喜欢唐诗，因无钱买书，他就向同学汪采白的父亲借来唐诗集抄写。他边抄边吟，十分入味。还书时，汪父问他唐诗中最推崇哪位诗人，陶行知不假思索地答道：“白居易和杜甫。”

“哦？为什么呢？”汪父又问。

陶行知像小大人一样解释：“白居易的诗通俗畅白，杜甫的诗深沉幽愤。虽然他两人的诗风格不同，但多是忧国忧民之作，呼出了人民的呼声。”

八岁时，陶行知的父亲去外祖父所住的万安镇谋生。外

祖父非常喜欢这个聪慧的外孙儿，有意栽培，便留他在吴尔宽私塾伴读。吴尔宽私塾古阔幽深，学子济济一堂，先生手执戒尺，好不威严。而陶行知总能凭着超强的记忆力，把先生教的功课背得滚瓜烂熟。

那几年的好时光为陶行知打下了坚实的经学基础，可惜好景不长，父亲的身体状况越来越不好，家境更加困难，他只得退学，回到歙县老家帮父亲做农活。不过，“小和尚”是块读书的料却是妇孺皆知，有亲友遂介绍他到县城向程秀才讨教《四书》，又听说前清的贡生王藻非常有学识，于是让陶行知向他请教《五经》疑难。15 公里的路程，一个 12 岁的孩子每隔几天就登门求教一次，风雨无阻，从未间断，这一点深得老师们赞赏，他们更加悉心指导他。

不多时，母亲被介绍到县城的一家由耶稣教会办的崇一学堂当佣工。母亲干活儿麻利，人又厚道勤快，英国牧师同样也是学堂堂长的唐进贤对母亲很满意。陶行知每回来探望母亲时也会搭把手干些活儿，把瓜果木柴挑去卖。看到窗明几净的教室，学生们活泼有序地上课，他既好奇又羡慕，有时会默默地在教室外倚着窗听老师讲课。来的次数一多，唐进贤和几个老师便对他留意起来，他们见这孩子机灵又好学，便特地准许他免费入学。

崇一学堂开设了英语、数字、理化、医学常识等科目，这些从西方传入的学科打开了陶行知的视野，让他明白除了《四书》《五经》以外，还有更为辽阔的世界。由此，他开始胸怀天下，关注和思考起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及走向。他发愤学习，三年的课程他两年就学完了。

这所耶稣教会学校的宗教背景也影响了他，他对耶稣舍己为人的精神深为感佩，基督的博爱成为他日后为教育而倾其所有地奉献的精神来源之一。

陶行知是幸运的，他像一株茁壮成长的小苗，既有传统的中国文化的灌溉，又有西方现代科学文化的营养摄入，正应了他后来所写到的“汇百川才成其为海洋，融中西学术之精华，乃创造之根基”。

毕业后的陶行知想继续求学，他在唐进贤的帮助下，考入南京汇文书院，第二年升入金陵大学文学系。安徽农村出来的穷小子一下子来到了省城，新的世界和新的气象让他一下子与时代接轨了。



“六朝古都”南京果然是当时的政治文化中心，秦淮河、夫子庙表面一派繁荣，但却无法给人安居乐业的闲适感：一种山雨欲来的气氛在空气中弥漫。大清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各种政治势力在相互角逐，全国各地到处是揭竿而起的起义和暴动，念了新学的青年学子们满脑子都是变法图强的新思潮……陶行知并不想置身事外，做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相反，他关注时局，如饥似渴地吸纳着新知识，并广泛涉猎西学，探索和思考着救国救民的良方。

当时的中国，革命的气息弥漫，特别是武汉，新军各标营均已建立起秘密革命的组织。湖北新军原为张之洞所练的

“江南自强军”，中下层军官不少曾官费派日留学，他们普遍接受了新思想，因而新军中遍布革命党人。

1911 年 9 月 24 日，文学社与共进会在武昌召开由双方负责人和新军代表 60 余人参加的联席会议，会上组建了起义的领导机构——起义总指挥部。文学社负责人蒋翊武被推举为总指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被推举为参谋长。10 月 9 日共进会负责人孙武秘密制造炸弹时发生事故，俄国巡捕前来搜查，受伤的孙武和其他人逃脱，湖广总督瑞澂闻知此事后下令全城戒严，搜捕革命党人，政治气氛非常紧张。新军工程营后队正目（相当于班长）熊秉坤等人决定提早起义，并请来吴兆麟作为起义军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参谋长。1911 年 10 月 10 日晚间 8 时，程定国发出武昌起义的第一枪，武昌起义就此爆发。11 日上午，武昌全部光复。12 日，革命党人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士兵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等在汉阳发动起义，光复汉阳，随后攻占汉口。至此，武汉三镇全部掌握在革命军手中，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后，各省都督府的 17 省代表来到南京，继续商讨建立中央政府事宜。12 月 25 日，孙中山从法国马赛回国抵达上海，受到许多革命团体的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总统人选。根据《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第一条的规定：“临时大总统，由各省都督代表选举之；以得票满总数三分之二以上者为当选。代表投票权，每省以一票为限。”参加选举的有直隶、奉天等 17 省代表 45 人，孙中山几乎以全票当选为第一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正式宣布中华民国成立，并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1月11日，临时政府确定了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为纲领，以南京为临时首都，以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国旗，象征五族共和之意。

“共和万岁！民主万岁！”这样石破天惊的呼声犹在耳边，然而没过多久，政局突变，孙中山辞职，将政权拱手相让给袁世凯，袁世凯在位时出台种种举措有意恢复帝制，“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被袁通缉，张勋复辟……国内的形势动荡不安，像漩涡中的河水，变幻无常。陶行知既迷茫又失落，然而他并没有消极避世，相反，他热情参与到社会实践活动中去。

临时政府陆军总长黄兴留守南京期间，为渡过财政上的难关，倡导在全国各地募集国民捐，而反对政府向帝国主义国家滥借外债。陶行知积极响应，他发起组织大学运动会，以门票收入充作“爱国捐”，帮助黄兴解决财政困难。他还任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光》中文报的中文主笔，撰文宣传民主共和思想。在校园里他是个活跃分子，发起各种展览会、运动会、爱国演说会……这些活动充分锻炼了他的组织才干。他数学很好，喜欢从不同角度开动脑筋，用几种方法来解答数学题；同时他也很热衷于生理科学实验，从而培养了从事实出发、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值得一提的是，20岁那年，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陶知行”。原来，进入金陵大学不久，陶行知在亨克教授的指导下，开始研究起明代大哲学家、教育家王阳明的学说。王

阳明是中国历史上非常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知行合一”论让这个青年深为倾慕，王阳明主张“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认为要把“行”与“知”结合起来，注重实践。陶行知对此思想深表认同，从此以后，他以王阳明的思想为标尺，来完善个体人格的修养和寻求救国之道。

陶行知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知识结构都是在金陵大学就读期间被锻造出来的。他既遍览中国古代文化典籍，又醉心于西方的声光化电、科学民主、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哲学等各种学说。作为处于大变革时代的中国人，他还对当时严复、梁启超、孙中山等先进中国人的论著有了深入思考。他胸怀祖国，放眼世界，把中国的前途与世界的未来联系起来考虑。他大声疾呼：“由感立志，由志生奋，由奋而捍国，而御侮，戮力同心，使中华放大光明于世界！”

数年寒暑，转眼迎来了毕业的日子。他的毕业论文《共和精义》获得了全校总分第一的好成绩。这篇洋洋洒洒八九千字的文章，蕴含着他对清末民初的社会现实的冷静观察和探究，其中又有对中西各种政治思想的广采博纳。他认为“共和者，人类进化之必然产物也”，他并不主张照抄西方模式，而提出应根据中国国情来实施“共和”。他在文中主张在政治、生计、教育上机会平等，应该发展教育、便利交通、依靠人文进化，维持一定秩序。作为一个象牙塔内的书生，此时已显现出他有志于投身教育事业的端倪。他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真正从理性上捍卫了共和主义，为他未来从事教育救

国事业，始终坚持先实验后推广，反对空谈，强调实干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14年6月，在隆重的毕业典礼上，美籍校长包文授予他美国纽约大学承认的文科学士文凭，江苏教育司司长黄炎培赞叹："真乃秀绝金陵之学子！"毕业典礼结束后，黄炎培关切地问道："陶君毕业后有何打算呐？"陶行知踌躇满志地回答："我想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教育。"

这是他所知道的世界上研习教育学的最佳学府，那里汇聚着一批教育成果丰硕的老师。他说出了自己的志向：

"我将以'教育救国'设为我一生的理想，现在国家内忧外患，处处民不聊生，靠军事革命哪里能创立真正的民主呢？我坚信，革新教育方是改变中国的必由之路。"

对于他的志存高远，黄炎培赞许地点了点头。

然而，他没有足够的经济条件去实现他的志愿。

"孩子，我们的家境你不是不知道。我没有能力挑起家庭的重担，已经很愧对你们了，你是家中的独子，承蒙一路上有好心的先生们无条件地赞助你的学业，好不容易才勉强维持到你毕业。家里的田太薄，你祖母也老了，你得体谅父母的难处哇。你念了这么些年书，要知书达理，懂得成家方能立业的道理。你妹妹文渼的同学小汪是个不错的孩子，性情也好，你们挑个日子把婚事办了吧，出国深造的事咱们不敢想啊。"

父亲的话让陶行知非常揪心，可是他不忍心违背父母的意愿，毕业后，他回乡遵父母之命成亲了。妻子汪纯宜果然性格温和贤淑，这让他深感欣慰。然而新婚的他并未陷入温

柔乡，去海外求学的念头一天强过一天，那是他的“强国梦”啊！他打听清楚了，国外有奖学金制，以他的聪明和刻苦，一定不难获取，那么，只要凑足路费不就可以迈出国门了么？说干就干，陶行知奔走于南京和徽州之间，积极筹措赴美留学的经费。在金陵大学校长包文的赞助下，以及通过向亲友借贷，陶行知好不容易才勉强凑足了基本的费用。

船票已经买好，去国离乡的日子近在眼前，烛影重重，陶行知欲言又止，终于，他有些愧疚地对新婚妻子话别：

“纯宜，我真是有些说不出口……咱们成亲时日不多，可我这就要动身去美国求学了。我希望你能理解。我这次排除万难去求学，不是为了自己日后的前途光明，而是为国家的富强寻求良方，只有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呐！这些道理你可能一时之间也不会明白，但我还是希望能得到你的理解和体谅。”

妻子强忍住离愁，安慰他：“你放心去学习吧，家里有我呢，我会照料好爹爹和妈妈的。”

陶行知握住她的手，感激地说：“你和文渼既是同学又是好友，今后家里就拜托你俩来主持了，凡事商量着办，家和万事兴啊！”

第二天陶行知邀约妹妹和纯宜一同到照相馆合影。姑嫂二人并排坐着，手里拿着花束，脸色却并非笑靥如花。离情依依啊，怎么笑得出来？陶行知站在她们身后，气宇轩昂，神色坚定。这张小照在异国陪伴了他三年。



1914 年，陶行知终于从上海的吴淞口登船，同行的还有从清华大学毕业的一同留美的陈鹤琴。海风阵阵，白浪滔滔，海鸥拍打着翅膀上下翻飞，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将承载他怎样的未来？

按陶行知的初衷，本想直接进入哥伦比亚大学深造的，但因学校学费高昂，负担不起，只有先在为外国学生免除学费并提供奖学金的伊利诺伊大学学习政治学。学习期间，他对西方流行的各派教育新思潮均有广泛涉猎与钻研，这些更加坚定了他将为教育事业投入毕生精力和心血的想法。他针对国内教育界因循守旧、不思革新的现状，回国后发表多篇

文章介绍西方的教育学说和各种新思潮，希冀以科学的试验方法改造中国的旧教育。

求学期间，又一位教育大家杜威带给了陶行知莫大的影响。杜威的教育哲学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变迁、行动和实用，主张“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经验的改造和改组”、“学校即社会”、“以儿童为中心”、“从做中学”，要求教育应当与社会有广泛的联系，要密切联系社会生活实际。同时，教育要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征和规律，要着重培养学生适应生活的能力，要培养学生的主动精神和发展学生的个性。他的批判精神、实验精神和创造精神，对于早就不满中国旧教育，亟欲建立一种新教育来维护和发展共和体制的陶行知而言，无疑有极大的吸引力。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陶行知独树一帜的生活教育学说，与他的精神导师杜威的学说一衣带水。但是陶行知从不盲从，全盘照抄别人理论，而是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充分总结自己长期教育实践宝贵经验的基础上，加以扬弃和发展。

陶行知业余时间靠打工来维持生活和赚取学费。每天下课后，他就到车站、码头、饭店打工，天黑回校，又一头钻进图书馆看书学习，往往直到图书馆关门，才最后一个出来回去休息。可美国的生活成本太高，他所赚的那一点钱简直是个零头。偏偏这时，在寒冷的 1 月，国内传来父亲逝世的噩耗。24 岁的陶行知悲痛万分，一时之间恨不得辍学归国，他是家中的独子，父亲逝世都不能回去，要那一屋的老弱妇孺怎么撑得下去？然而他还是按捺住了归国的冲动，决心学成后以报效国家来寄托对父亲的哀思。他掏出长期珍藏在上

衣口袋里父亲寄给他的信，看了又看，直到眼泪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清楚地记得 17 岁那年要到杭州投考，身体不好的父亲送他到水蓝桥下船，一脸的殷切期望和恋恋不舍之情。他后来写了一首诗：

古城岩下，
水蓝桥边，
三竿白日，
一个怀了无穷希望的伤心人，
眼里放出悲壮的光芒，
向船尾直射在他儿子的面上，
望到水、山、天合成一张大嘴，
隐隐约约地把个帆影儿都吞没了，
才慢慢地转回家去。
我要问芳草上的露水，
何处能寻得当年的泪珠？

父亲为了支持陶行知的国外学习，硬生生地戒掉了抽大烟的积习，他认为能省一点是一点，尽量为儿子凑学费出一分力。这需要忍受多大的痛苦才能做得到啊！

时隔三个月，长子陶宏出生的消息又从祖国传来，这让陶行知在心生欢喜的同时，又平添了对父亲的缅怀之情，一生操劳的老父亲居然等不到看一眼长孙的面容，等不到长子回国尽孝，这是何等的遗憾啊。与此同时，陶行知在海外除了得自费完成学业外，还得承担国内家中生活所必需的开

支，经济非常困难。虽然他获得了部分“庚款奖学金”，但是因为美国的生活物价高，这笔钱实在是微不足道，远远不足以应付深造所需的费用。

无奈之下，他向当时的老师孟禄教授求助。孟禄教授是个非常热心的人，对这位刻苦的中国留学生青睐有加，他及时地伸出援手，亲自出面帮助陶行知申请美国利文斯顿奖学金。在孟禄的指导下，陶行知给担任院长的罗素写了个申请书。由于有孟禄教授的相助，陶行知顺利地拿到了奖学金，这为顺利完成学业提供了经济方面的保障。

1917 年，陶行知终于从哥伦比亚大学学成归国了！太平洋的海景如故，他伫立在甲板上沐浴着海风，临海远眺，海船的颠簸没有让他有丝毫的慌乱，归心似箭啊。他决心回国后与其他教育家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个有效的公众教育体系，发展和保持一种真正的民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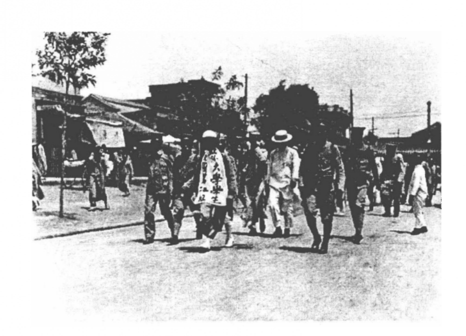
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长郭秉文的邀请下，陶行知担任该校教员兼教务助理，先后讲授《教育学》、《教育行政学》、《教育统计》等课程，两年时间，他由一名普通教员，升为主任教员，直至出任教务主任。

28 岁时，陶行知是一名意气风发、年轻有才的教授，然而他仍旧像读书时一样，关心时政，时刻以分担国家忧患为己任。

这个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然而，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并没有得到胜利的果实与喜悦。从 1918 年 11 月的“公理战胜强权”庆典，到次年 1 月的巴黎会议，短短两个月时间，当时的中国充分诠释了“自古弱国无外交”

的定律，所谓的“公理战胜强权”不过是一个美丽的童话而已。面对这样屈辱的局面，从5月1日开始，北京的学生纷纷罢课，组织演讲、宣传，随后天津、上海、广州、南京、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和工人也给予支持。

1919年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所谓的“和平会议”，中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参加了会议，中国代表在和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和取消“二十一条”等正义要求，但巴黎和会拒绝了中国代表提出的要求，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此消息传到中国后，北京学生群情激愤，学生、工商业者、许多爱国团体纷纷通电，斥责日本的无礼行径，并且要求中国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不能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在这种情况下，和会代表提交了关于山东问题的说帖，要求归还中国在山东的德租界和胶济铁路主权，以及废除“二十一条”等不合法条款。但结果，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居然准备在《协约国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上签字，仍然同意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送给日本。在巴黎和会中，中国政府的外交失败，直接引发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从而引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在如此强大的压力下，中国代表最终没有出席巴黎和会的签字仪式。五四运动轰动了整个中国，陶行知也投身其中，5月9日上午，他在南京6000人声援五四运动的游行集会上，痛斥卖国的“二十一条”，下午他还参加了江苏省教育会举行的国耻纪念大会，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强烈要求帝国主义归还青岛。



1919 年 6 月 4 日，被拘捕的国立北京法政大学学生。

在学校里，陶行知继续推行他的革新教育，大声疾呼男女平等，女生也有受教育的权利，他多次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校务会议上提出《规定女子旁听办法案》，主张应允许女生进入大学学习；在招生名额上，他强调“不论男女，均可录取”，还规定了录取女生的比例，经过他不懈的努力，终于促成了南京高等师范学校首次招收女生。

优越的生活并没有让他感到满足，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初衷，也没有忘记自己的理想。他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的平民，无奈十几年的学校生活，渐渐地把我向外国贵族的方向转移，经过一番觉悟，我就像黄河决了堤，向那中国的平民的路上奔流回来了。”



陶行知的理想不仅仅是做个教授或者校长之类的官，而是要改变旧中国几千年来的落后的教育现状。所以，自1917年底，陶行知和当时的另一个教育家蔡元培等人就积极酝酿成立一个旨在促进中国教育变革的组织。1921年12月，一个崭新的教育组织诞生——中华教育改进社。这个新型组织以“教育的科学研究”与“科学教育的改善”等思想作为口号，并确立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改进”为宗旨，推举蔡元培、陶行知、郭秉文等知名学者为理事，还邀请世界著名的教育家——陶行知留学美国时的导师孟禄和杜威做名誉理事，在当时的社会掀起很

大的震动。中华教育改进社一经成立，成员就超过500名，是当时中国最大的教育研究团体，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新型教育在中国的发展。

在促成中华教育改进社成立之后，陶行知又把目光放在了中国广大贫苦大众身上。为此，他毅然辞去了大学的职位，放下飞黄腾达的机会和高官厚禄的社会地位，“自讨苦吃”，去乡下寻找一片新的教育天地，开垦他的教育梦想。

陶行知认为：“中国人有百分之八十不识字，当时这个数字是三万万二千万人。这些不识字的人里面，至少有一万万是十二至二十五岁的青少年。为了使这一万万人在很短的时间里，受到相当的教育，就希望他们在百忙中每天能抽一点工夫来受四个月的平民教育。”这样，陶行知的“平民教育”想法产生了。

开展平民教育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教材的编写，陶行知为此身体力行，和中华教育改进社的很多知名教育家共同研究平民教育课本的编写。当时由他与朱经农共同编写的教材《平民千字课》，这本书的编写耗时一年半，是从数万个字中选取一千个常用字编成汇本，一共四册，总共96课时。这本书被后人奉为经典的教材，只需学生每天用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去学习，不到四个月就能把这一千个常用字学完。

有了教材，接下来就是实践，为此，陶行知先在自己家里开办了“平民读书处”，让六岁的儿子教祖母识字，十多天后陶行知的母亲居然也能读信了。母亲的学习过程，让陶行知很受鼓舞，他开始在全国各地发起成立平民读书学校，遇见车夫、渔民，甚至要饭的孩子、饭馆的厨子，他都要送

上自己编写的《平民千字课》，让他们学完后再去教身边的人。

回到南京后，陶行知更是在南京走街串巷，说服私塾先生把课本换成《平民千字课》，甚至亲自说服栖霞寺的和尚也来识字读书，以取得“国民识字文凭”。他还到军队、工厂、监狱、济良所里宣讲自己的平民教育思想。这样，陶行知的足迹，开始从长江流域跨到黄河流域，其影响也越来越大。

在当时的中国，想在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的国家推翻旧观念，推广新事物，还要发动广大民众亲身参与，其中的重重困难可想而知。有一次，陶行知的一个亲戚写信给他诉苦，说自己在给周围的人作平民教育的推广时受到很多不明事理的人阻挠，所以心情非常沮丧。陶行知在回信里告诉他：“在社会上做事就要预备碰钉子，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有两个：一个是以钢头碰铁钉的精神，把钉子碰弯；第二个是用自己的无限热情把钉子熔化掉。”

陶行知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从开展平民教育开始，他先是在安徽芜湖，发动了一万多人参加的平民教育大游行；然后又马不停蹄地到了南昌，发起数千人的大游行；再从南昌过九江，沿长江到武汉，发动了三万人参加的平民教育大游行……他以这样的燎原之势，在全国迅速掀起了平民教育运动的高潮。

有一组数据：在1923年前后仅凭陶行知的奔走呼号、上下动员，短短几年，仅仅南京城内就办起了31所平民学校，学生共计2000多人。甚至《平民千字课》当时被外国

人用于学习汉语之用。陶行知在一封信中提到美国人读《平民千字课》的效果："大使夫人是位美国朋友，她读了《平民千字课》一个月，我便写这信与她，她能懂得其中的大意。"

鉴于平民教育所取得的成绩，1926年，陶行知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陶行知在《宣言》中说："本社（中华教育改进社）的乡村教育政策是要乡村学校做改造乡村生活的中心，乡村教师做改造乡村生活的灵魂。我们主张由乡村实际生活产生乡村中心学校，由乡村中心学校产生乡村师范。乡村师范之主旨在造就有农夫身手、科学头脑、改造社会精神的教师……"他在《宣言》中提出了"教学相合"的原则，还提及了自己的宏伟目标："要筹募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同志，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自此，陶行知完完全全地从大学教授转变成为一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后来在给家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生在这个社会，都有相同的使命，那就是运用我们全副精神，来挽回国家命运，并创造一个可以安居乐业的社会交给后代。这是我们对于千万年来祖宗先烈的责任，也是我们对于亿万年后子子孙孙的责任！"



1927年1月，刊登在《新教育评论》上的一则新颖独特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招生》的广告引起了社会各界人士的纷纷关注。这则广告明确地写着培养目标是将师范的学生锻造成具备“有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同时还有健康的体魄和对艺术的兴趣”的人才。除了介绍考试科目外，广告中还特别注明：“小名士、书呆子、文凭迷，最好不来。”

这则消息一经发布，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教育界顿时一片哗然，一时间，索要招生简章的信件如雪片般涌到一个人的手中，这个人正是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的创办人：陶

行知。

原来，陶行知的平民教育引起巨大反响后，有很多知名学府纷纷邀请他去任职，可他都一一谢绝了。他的目标很坚定，行动也很快：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了试验乡村师范学校，想通过培养具有“康健的体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艺术的兴趣，改造社会的精神”的乡村教师，以实现他“改造一百万个乡村”的伟大愿望。陶行知的这个举动，具有伟大的划时代意义：他成为我国最早提倡建立乡村师范学校，并付诸实践的第一人。

在寄来的信当中，有一封是清华大学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操震球写来的，操震球在信中表白：“我决意从事乡村教育，创建中心学校，鞠躬尽瘁……”陶行知读罢信件，对这位青年的志向感到非常欣慰，迅速回了封信，这封信不单单是褒奖这位学生的志气可嘉，更多的是希望他不是仅凭一股理想而盲目行动，而是必须认清现实的艰苦以及所会面临的种种困难。陶行知在回信中写道：

> “您既有这种宏愿，我就应当把个中的甘苦，明明白白地告诉您，还望您慎重考虑一番，再行决定。田家生活是要蛮干的，您愿意吗？您能打赤脚在烂污泥里奔走吗？您不怕把雪白的脸晒得漆黑吗？您不怕软手上起硬茧吗？您不怕在风霜雨雪中做工吗？您不怕挑粪吗？您愿意和马牛羊鸡狗猪做朋友吗？以城里人的眼光看来，这都是苦处；其实乡下人并不以此为苦。纵然这是苦处，乡下人也有城里人想不到的乐趣。乡间山清水

秀，尽您浏览。您早上可以看旭日东升，引您兴奋。晚上可以待月西山，助您吟咏。到了收成的时候，您手里割着黄金似的稻子，那田家乐的山歌，不断地洋洋乎盈耳。您还能亲眼看见您所栽培的儿童个个桃李似的一年一年地长大，一直到成家立业。您还能亲眼看见全村农夫农妇人人读书明理、安居乐业。您也许可以看见您的村庄和全国的村庄都成为村民自有自治自享的村庄，也许您亲眼看不见，要到令郎令孙的时代才能看见，您能忍耐吗？倘使经过这番考虑之后，您决定要来投考，我们万分欢迎……”

尽管陶行知给这个热血青年设下一串一串问句，但他的笔下，将办学的一切都诗化了。困难诗化，痛苦诗化，所以一切都说得如此从容和无畏。正是由于陶行知的崇高人格的感召力，操震球毅然放弃了清华大学的学籍，投身到试验乡村师范学校里来，并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伟大的教育事业。

伟大的事业注定不会一帆风顺，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入学考试当天，并不太平。大革命的内战正酣，南京城枪炮声不断，各个学校为避免战事牵连都纷纷停课，唯独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偏偏定在这一天招考。

“校长，外面到处都在打仗，时局这样乱，学生们恐怕是来不了啦，不如索性往后推两天，选择其他日子吧。”有人好心劝道。

陶行知不是不担心，但是他思量再三，决定要与村民们同担当、共进退。因为村民们都冒着枪林弹雨照样种田耕地

不误，那学校的招考也理应按原定日子执行，决不变更。真的会有人乐意冒着生命的危险来这个穷乡僻壤考试吗？苍天不负苦心人，考试这天，真的有13人前来报考！这大大出乎陶行知的预料。他看着这些从北京、上海、杭州、苏州、武汉等地冒着炮火风尘仆仆地赶来，认真按照每一个考试步骤发挥自己才智的青年们，眼睛有些湿润。他不禁回忆起两年前，到乡村办学还只是盘桓在他脑海中的一个理想，然而现在理想即将实现，这是何等的美事啊！

从1925年开始，陶行知就为筹划建立乡村试验学校而多方奔走，他组织研究员对乡村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社会调查，在这个农民占全国人口总数85%的国度，农民的地位与处境决定着民族的兴衰。他果断提出：教育是立国的根本，必须使教育下乡。他说："中国以农立国，人们十有八九住在乡下，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乡村教育，关系到三万万四千万人民之幸福。"

很多人也许要问，明知道这个地方战火纷飞，那为什么还要把学校选在这个地方？说起这个乡村试验学校的选址，也有一段佳话。当初，陶行知和赵叔愚、邵仲香在北京、上海、杭州效外四处寻找合适的校址，都没有找到满意的地方。这年初春的一天，他们和钱尚志一行人来到南京和平门外燕子矶附近的一个村子，这村子名叫小庄，背枕老山，前面能望到紫金山。此处的住户并不多，因而地广人稀，视野辽阔，看起来和所有农村一样，荒凉而落后。然而由于春回大地，这里毕竟有着心旷神怡的田原美景：溪水叮咚、百花吐蕊，新鲜的空气中弥漫着阵阵花香。

陶行知环视了一圈，扶了扶眼镜，有些兴奋地大声对随行的人喊道："这里好，学校就建在这里了！你们各位意下如何？"

钱尚志也赞不绝口："还是陶先生你眼光独到啊，这个地方很富有诗意！"

陶行知笑着说："世道要改，教育要改，这地名也要改一改！老山这个名字不好，把它改作'劳山'，小庄也改为'晓庄'。我们在这里开办试验师范学校，劳力又劳心地发展乡村教育，日出而作，相信长此以往，中国的教育必将迎来破晓的曙光。"

说着，陶行知诗兴大发，即兴哼起了两句诗："老山劳，小庄晓，新时代，推动了。"大家都听得两眼放光，拍手称好……一行人都很振奋，边走边议，仔细考察了一圈村子的全貌，与陶行知一起规划着哪里的空地适合修礼堂，哪里的树林建图书馆和艺术馆比较妥当，把校舍建在哪里最合适……

陶行知指着不远处一片桃林说："你们看，那里修建宿舍再好不过了，可以叫'桃花村'。"陶行知仿佛打开了话匣子，滔滔不绝地倾吐出胸中的规划："在前山坡上建几个草房，我就可以接全家人搬过来住。大诗人陶渊明当年不是在自家门前种下五棵柳树，自号'五柳先生'么？我也附庸一回风雅，在小草房周围栽上几棵柳树，取名叫'五柳村'吧。"

"这么大一片地，可要不少钱呢。"终于有人谈到实际问题。

陶行知笑了笑说：“钱的事，我会多方筹集的。”

诗情画意从口头落实到具体行动中是需要一番拼搏的实干精神的。由于政府不掏一分钱，陶行知只得在朋友中间募捐，然而所筹集的经费少得可怜，此外村里的乡绅也从中作梗，毁约不肯将地皮卖给他，此外在开工过程中，由于资金短缺发不出工钱，工人们罢工，导致乡村试验学校兴建计划一度搁浅。



有一次，陶行知刚领到一万多元的稿费，他兴冲冲地拿回家，小心地将钱锁进柜子里。妹妹文渼见状，对哥哥锁钱的行为大惑不解，要知道，家里的生活费已经快用光了，于是开口道：

“哥，家里已经没钱了，米缸见底了，嫂子也该买药了，另外孩子的衣衫早就烂了，得扯几尺布再做两套，小孩长得快。”

一直以来，陶行知国内国外忙读书、忙教学，文渼成了家中的顶梁柱，替他这个家中的独子侍奉母亲，照顾生病的嫂子，从而撑起了整个家。陶行知沉默了一下，轻声地问

道："你想要多少钱呢?"

文渼知道哥哥的脾气，要多了会招来一番义正辞严的辩驳，她在心里小心翼翼地合计了一下，说了个保守的数字："暂且……留四分之一作家用吧!"

陶行知想了一想，说："你要四分之一，按道理说起来也应该，但我这些钱要拿去办大事，不能给你。文渼呀，你的头脑里正是缺少了这四分之一的觉悟，不然你就是我的好妹妹了。"

文渼生气地说："这家和儿子都是你的，这钱又不是给我一个人用，你不给我钱也行，一家人就全喝西北风去吧!"

陶行知轻声地说："这一笔钱，是我要去南京劳山脚下办晓庄师范的办学经费。我们家虽穷，粗茶淡饭还能勉强度日。中国三亿多农民非但没有饭吃，还没有文化，他们的日子不是更苦么？更是一点希望都看不到啊。我把这些钱拿去办学校，用教育去改造农村，是尽我们的绵薄之力去帮助他们。至于家里的花费，咱们再想想其他办法，你省着点用，算是帮我去办大事吧!"

文渼听完哥哥的话，点点头，不再生哥哥的气了。

1927 年 3 月 5 日，陶行知用筹集的开办费 1 万元，常年经费 1.2 万元，设备费 5000 元，购买了南京神策门外的晓庄田园 200 亩、荒山 10 里作为校址和农场，将燕子矶小学、尧化门小学收编为第一、第二中心小学。

为了合理规划好校舍，陶行知废寝忘食，常常借住在当地农民家里。农民们没想到，这个喝过"洋墨水"，放着大

学教授的职位不干，跑到农村来建学校的陶校长居然能屈尊住在那间遍地堆积着牛粪的小屋里，忍住强烈的气味，若无其事地和牛同住一个星期之久。陶行知见了人还笑盈盈地说，和牛大哥同睡，只闻牛粪香，不觉办学苦。他对家人说得更乐观："牛大哥脾气很好。我睡在稻草上，暖和得很，比钢丝床还有趣。"在给母亲的信中他这样写道："行知近在乡村师范工作，快乐得像活神仙一样，整日打赤脚，穿草鞋，自由得很。大前天我们造了个毛厕，前天自己做了个浴室，昨天又自己做了个厨房，明天晓庄小学就要行开学礼了。"

怎么给这批"珍贵"的学生物色好的老师呢？陶行知知道，把这批学生教好了，就像春天精心播撒的优良的种子，中国大地上的人才会如同一茬又一茬的稻子层出不穷。他到上海与董事们汇报办学的筹备经过，商定了学校行政机构的设立及职能，并写信给后来任科学指导员的吕镜楼，感谢他愿意来晓庄工作，"谨为全国农家子弟鞠一万个躬"；他还写信给教育指导员杨效春，称"得弟胜得百万金"，还有武术指导员、美术指导员、生物指导员……他求贤若渴，为了给学生请到最好的老师，他一个一个去游说、去感激、去拉来。热心于乡村教育事业的志士们被陶行知的报国理想和人格魅力所折服，纷纷来到这个贫穷落后的村子里"俯首甘为孺子牛"。

终于迎来了3月15日，这是晓庄师范学校举行开学典礼的日子。这天的天气晴好，阳光穿过郁郁葱葱的树林洒下来，桃花似乎格外娇羞艳丽。师生们早早就为来宾搭起了四



晓庄师范

座帐篷，为他们提供就座的场地。用木板搭成舞台，向农民们借来八仙桌和几条板凳，这就是典礼的全部陈设。百把个学生，陶行知请来的数十位社会名流和教员，以及来看热闹的周围乡邻，将学校围得水泄不通。同学们庄严地举起由陶行知亲自设计的校旗，让它高高飘扬在晓庄的上空。远处，硝烟弥漫，炮火隆隆。

“乡亲们！来宾们！同学们！这是北伐军向南京发起总攻的枪炮声，也是为我们学校的开学典礼鸣放礼炮，来得正好哇！虽然我们的校舍还在继续建设中，但是我们的教程必须按时进行。中国教育现状的改观，刻不容缓，时不我待！中国几千年来的教育，积习严重，那是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死书本死教育，一个乡下先生只晓得像只孤鸦似的在破庙里教死书，办学与社会完全隔离，这样教出的‘老八股’与人民群众有什么关联呢？我们要根据中国的国情，改革旧教育，而年轻的你们，是乡村教育的希望啊！我相信，只要咱

们师生一心，共同努力，你们一年就能使学校气象生动，两年就能使社会信仰教育，三年能使科学农业著效，四年能使村自治告成，五年能使活的教育普及，十年能使荒山成林，废人生利！我们的目标是为三万万多农民服务，国家有一块未开化的土地，有一个未受教育的人民，都是由于我们没尽到责任！”

“同学们，你们看看头顶上这一面晓庄师范的校旗吧，这是不才我亲自设计的，我想告诉大家它的寓意：一个‘活’字在图案的正中间，意思是：活的教育，手脑并用，自觉觉人。圈外有个等边三角，代表教学做三者合一。三角上面有一个‘心’放在当中，表示关心农民甘苦之意。左边有一支笔，右边有一把锄头。三角之外有一大圆圈放射光芒，好比是太阳光。四周围绕着一百颗星星，它代表征集一百万位同志，倡办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我们的校舍上面盖的是青天，下面踏的是大地，我们的精神充满宇宙天地之间！”

陶行知讲得慷慨激昂，学生们禁不住热烈地鼓掌，而教员们几乎全都感动得掉下泪来。



晓庄师范学校开学了，当时校舍还没有建好，大家便在山下立起三五个帐篷，搭建临时居所，后来师生增多了，只得将一部分师生分投到附近的农家去住。由于投考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越来越多，即便是后来校舍建起来后，房间仍是不够，一些学生还得住在农家。

陶行知亲自设计校舍，虽然全部房屋都是茅草屋顶和土墙，再配上大玻璃窗，可他仍然希望在这样简陋的材质中体现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风格。他发挥创造力，将每一个房屋的形状都设计得各不相同。虽然都是以土坯垒墙、茅草作顶，但统一和谐中又各有特色，显得经济、朴实又典雅大

方。他不光负责设计，还监督工程质量和进度，并带领着学生们一起动手施工。可以说，晓庄师范学校的一砖一瓦，无不浸润着陶行知的心血。

在建造晓庄师范学校的过程中，陶行知不是“苦中作乐”，而是“以苦为乐”。他始终有着诗人的特质，时不时地神来几笔。学校的礼堂大功告成那天，他在学生们的簇拥下，兴致勃勃地参观大礼堂。“陶校长，您说咱们学校的礼堂叫什么名字好呢?”一个学生歪着脑袋问。陶行知扶了扶眼镜，望向正在田垄上耕地的农民，略略沉吟片刻，说道：

“我们办晓庄师范学校就是为了把教育还给最需要教育而被隔绝于墙外的乡村人民！‘犁间开心路，障碍挡不住。一心往前进，奔往幸福处。’我们就把这个泥土墙、茅草顶的礼堂命名为‘犁宫’吧!”

“好一个犁宫！真大气！那，图书馆叫什么呢?”

“图书馆的功能就是为了让学生读书，可……读书稍不留神，就容易读成书呆子。你们知不知道，中国有三种呆子：书呆子、工呆子、钱呆子。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呆子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钱呆子是赚死钱，死赚钱，赚钱死。对于书呆子我是劝他们少读点书，多干点有意义的事，免得呆头呆脑。所以，就叫‘书呆子莫来馆’吧！一方面叫书呆子不要来，一方面叫工呆子、钱呆子多看些书，把头脑弄得清楚一点，好把世界的事看个明白。正如谚语所说的‘用书如用刀，不快自须磨。呆磨不切菜，何以见婆婆’。”这番妙语连珠说得学生们恍然大悟又乐不可支。

“校长，那咱们新挖好的厕所叫什么?”发问的是个调皮的学生，这一问分明是在打趣他。

陶行知却饶有兴致地接过话题，高兴地说：“那些吃饭不种稻的富人们，把粪便当作最讨厌的东西；农民却要靠它作肥料，把它当作最可贵的东西，像黄金一样珍贵。今天我们就给这座厕所命名为‘黄金世界’好不好?”

“好!”师生们爆发出开心的欢笑，感染得周围的空气都洋溢着欢乐的成分。

陶行知始终有着诗人的特质，他信手拈来将厨房命名为“食力厅”；将课室、宿舍所在地命名为“桃花村”、“杏花村”、“樱花村”。

对于校门，他的见地更是独到：

“我们无须铸围墙，也无须起门楼，只需要做个门框，上面写着四个大字，让人找不错路就行了。”

最后，这“晓庄师范”四个大字由国民党元老、书法家谭延闿用颜真卿体挥笔而就。这一决定为后来人们的疑问埋下了伏笔。有人问陶行知：您这个晓庄师范学校有多大?多少面积?陶行知笑答：你看晓庄地区有多大，我学校就有多大，整个晓庄地区都是我的学校。一堵没有围墙的学校，真正体现了“社会即学校”的观念。

晓庄师范学校从开始的13名学生，很快发展到150多个，很多人慕名而来。在9月初的第二期招生中，居然招收到了两名女生，陶行知高兴地称赞：“你们这样有勇气、有魄力到晓庄来，我们无比欢迎啊！你们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到乡下去的女学生!”

然而，时局尚不平稳，坐在教室里安安静静听课几乎成为一种奢谈。谁也没料到，晓庄师范的第一课，竟是救助难民。战火之下，南京城的老弱妇孺们东躲西藏，好不凄惨。陶行知为了救护难民，与红十字会联系，组织晓庄师范和安徽公学的师生，成立了两个红十字救护队，还在燕子矶小学挂出了妇孺收容所的旗帜。一时之间，300 多个难民，有的担着锅、米，有的挟着衣被，有的背着孩子，吵嚷声、叹息声、哭泣声、呼号声、东西撞击声，应和着城外传来的枪炮声，使这间小学喧腾了起来。陶行知带领着十几个晓庄师范学校的师生，不仅要管他们的饮食，还要给他们看病，晚上还要在凛冽的寒风中，手持木棍，轮流为他们站岗放哨，防止败兵的骚扰，保卫他们的安全。这些难民中不乏一些未成年的孩子，陶行知又为他们办了一个临时幼稚园，一个临时小学，一个临时平民学校，一个临时看书处。陶行知还从陈鹤琴主办的鼓楼幼稚园借来桌椅和玩具，供孩子们玩耍。晚上还要开同乐会，给大家解闷，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苦难。



3 月 24 日，北伐军进入南京，陶行知和师生们一同欢迎北伐军进城。陶行知还亲自掌勺盛粥慰问这些满身尘土的辛劳战士。夜间，他又亲自带领救护队到上方桥一带去救护伤员。

经过了战火洗礼的第一课，陶行知发现学生们都长大了不少，动手能力变强了，也懂得怎样关怀别人，能设身处地地为他人着想。

为了让师生们经常接受劳动教育，陶行知还特地开辟了一个试验农场，作为师生学习农事和劳动的基地，每个学生分配菜地一分，普通农作物地五分，荒山地一亩，由各人负

责耕种，收获的产品交农场收购，这样学生可获得一定的经济收入，可解决部分学生的经济困难。陶行知戴着草帽，打着赤脚，挽着袖子，和师生们一起，在田间栽秧、锄草、浇水、施肥，真正体验着农民的辛苦。

手把个锄头锄野草呀，
锄去野草好长苗呀，绮雅嗨，雅荷嗨，
锄去野草，好长苗呵，雅荷嗨；
五千年古国要出头呀，
锄头底下有自由呀，
绮雅嗨，雅荷嗨，锄头底下，有自由呵，雅荷嗨；
天生了孙公做救星呀，
唤醒锄头来革命呀，
绮雅嗨，雅荷嗨，唤醒锄头，来革命呵，雅荷嗨；
革命的成功靠锄头呀，
锄头锄头要奋斗呀，
绮雅嗨，雅荷嗨，锄头锄头，要奋斗呵，雅荷嗨……

这一首由陶行知作词的《锄头舞歌》，是晓庄师范学校的校歌，可它一点儿也没有高深难懂的“道学气”，相反，它朴实轻快，连农妇们都喜欢哼唱，很快这《锄头舞歌》就在晓庄传遍，甚至风靡南京，被妇孺老幼颂唱，全国各地教育界人士来晓庄师范学校参观者络绎不绝，《锄头舞歌》又迅速传遍国内外。

晓庄师范学校晚上有两个小时的自修时间，主要是学生们记日记、整理笔记、看书。此外，师生们还自主地轮流值日、守夜，还进行招待、烹饪等工作。星期天，除留校值日的师生外，其他师生都会组成游览小组，到南京各个名胜地区游览观光。晓庄的师生们到玄武湖荡舟，欣赏荷花；到明孝陵凭吊，欣赏石刻艺术；到栖霞山远游，欣赏枫叶，这些景点到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后来，晓庄师范学校的名气太大，星期天从外地来校参观的人实在太多，而许多专家、教授只有星期天才能来校指导，所以，他们不得不把星期五作为假日，星期天照常工作学习，而且成了最繁忙最紧张的一天。

晓庄师范学校的娱乐活动也是多姿多彩。晓庄师范学校经常召开娱乐会和与农民联欢的运动会、联欢晚会等。有一次，他们举办了一个别开生面的化装同乐会，各人都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和艺术天赋，尽量装扮得与众不同，使人大吃一惊。邵仲香先生化装成老农，可谓天然本色，惟妙惟肖。方与严同学化装成木匠，手拿刨子，眯着眼瞄墨线，简直就像中心木匠店里王师傅的化身。李仪寿同学扮作算命先生，手敲小锣，自称李半仙，能知过去未来。叶刚装扮成卓别林，手舞文明棍，脚穿大皮鞋，走着蹒跚的步子，惹得大家捧腹大笑。郭风韶头戴礼帽，西装革履，俨然一副大少爷的气派。程本丽和王琳装扮成乡下姑娘，大家开玩笑说要把“她们”介绍给老农。

晓庄师生与附近各村庄农民举行的联村运动会，也是别开生面、富有情趣的。陶行知在《我们的信条》中说：“我

们深信健康是生活的出发点，也就是教育的出发点。”所以，在晓庄师范学校的培养目标中，由原来的农夫的身手、科学的头脑、改造社会的精神三条，增加了“康健的体魄”和“艺术的兴趣”两条，而且把“康健的体魄”列为五个目标之首。为了在农民中开展体育运动，陶行知发起成立了“农民武术会”，以恢复“我国国民固有的尚武精神”。晓庄师范学校还决定在每年春秋两季举行两次大型的联村运动会。

除了运动会，学校还成立了晓庄科学社，请在美国学习生物八年，回国后主持生物研究所的秉农山先生定期来校讲学。秉先生非常支持陶行知的事业，他带领晓庄师范学校的学生对长江下游沿岸进行了科学考察，采集制作了一千多件动物标本、两千多件植物标本，陈列在两间大教室里，并以此为基础，组建了种类丰富、规模颇大的生物室。他还在农场里指导学生们饲养牛、羊、驴、鸡、鸭、鹅、猪、狗、猫、兔，让农场成了个小小的动物园，既使大家增长了知识，还平添了不少生活的情趣。

很快，在学校方圆一二十里的村庄，不仅出现了一所崭新的乡村师范学校，而且一个个乡村中心小学也像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这些中心小学的校长和老师，正是晓庄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陶行知的“教育版图”迅速扩大，一年之内，他又创办了中国第一家乡村幼稚园，请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友、中国儿童教育的开路人陈鹤琴担任园长。

晓庄师范学校以其革新精神闻名中外，吸引了中外许多教育家和名流前来参观、访问、学习，甚至吸引了蒋介石、

宋美龄夫妇两度前来。它的名声传到了国外，连泰国曼谷的华侨学校，都到晓庄师范学校来聘请老师。陶行知当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求学时的班主任克伯屈教授也远渡重洋来到晓庄师范学校考察，他更是对晓庄师范学校的生活教育实践予以高度评价，他预言：晓庄师范学校必将在历史上留下地位，一百年以后，大家还要回过头来，纪念晓庄！欣赏晓庄！陶行知对此非常欣慰，他又确立了下一步发展宏图："我们第一步要谋中国三万万四千万农民之解放，第二步要助东亚各国农民之解放，第三步要助全世界农民之解放。"

大概是名声在外的缘故，一些心狠手辣的土匪以为晓庄师范学校必是个富得流油的地方，于是他们动了歪心思。一次，盗匪用飞刀"寄"来了一封恐吓信，信上写："陶行知先生：兄弟们要回家，商借大洋三百，十月九日前放在村东的大树旁，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老师们急得团团转，陶行知却很镇定地劝道："莫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他立马去找冯玉祥将军，与他讨论农民们缺乏自卫武器，对于嚣张的盗匪束手无策等麻烦问题。冯玉祥将军大力支持陶行知"武力自保"的举措，并下拨一批款项。回校后，陶行知积极发动群众组织联村自卫团，购买枪支弹药，进行军事训练。陶行知并从容地在大树干上贴了一封回信："我为穷人办学，大洋三百没有。请来晓庄读书，读书明理做好人。"

每天早上，学生们在犁宫前的操场上练武术，既强身健体又能防身。上午，师生分为社会组、农艺组、生物组、数理化组、儿童文学组、图画组、音乐组、体育游戏组，分别

进行实践教学。下午，师生主要进行农事活动、制造简单仪器，或进行音乐、工艺、采集标本等活动。每周四下午，师生到农民家里，与农民谈心，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学校规定每个人都必须要交一两个知心的农民朋友。晚上除有一两个小时的自修以外，师生们还要轮流担任值日、守夜、招待、烹饪等工作。

当时，乡村根本没有医院，农民看病得跑到城里，而且医药费高得吓人，一些无钱的农民得了病只好用土办法来治，庸医、巫师又乘机骗钱害人，农民只好等死！陶行知便提议由晓庄师范学校办一个乡村医院。一开始，由学校的卫生指导员马绍季担任医生，后来，一位从美国留学归来的陈志潜医生，协同学医的夫人一起，谢绝做国民党政府的卫生署长之职，自愿来晓庄师范学校协助陶行知办乡村医院。

医院就设在学校附近的一座小庙里，农民和他们的子女就医，一律免费。医院救治了许多病人。农民们一提起马绍季医生和陈志潜夫妇，无不伸起大拇指。

当时的晓庄，偏僻荒凉，常有散兵游勇在此流窜为匪，祸害百姓。晓庄师范学校在冯玉祥将军的支持下，成立了晓庄联村自卫团，不仅打击了土匪的嚣张气焰，还发起禁烟禁赌的活动。他们到农村做宣传，宣讲吸鸦片之害，号召人人投入禁烟运动，烟赌一度几乎禁绝，他们在乡村改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晓庄师范学校的师生们不仅宣传禁烟禁赌，在霍乱流行的夏天，他们还做宣传防疫工作，将疾病的预防措施详细地说给农民们听，有效地控制了瘟疫的蔓延。有一年旱灾，蝗

虫肆虐，它们遮天蔽日，来势汹汹，所到之处，树木光秃，禾苗无踪，连屋顶的茅草也被啃得精光，农民们面临着颗粒无收的惨境。又是陶行知，他联合附近几乡的农民，成立了灭蝗总指挥部，动员全体师生投入到灭蝗的战斗，总算消灭了蝗灾。

陶行知还诚挚邀请大剧作家田汉带领他的南国社来晓庄演出，田汉慨然应允。在隆冬腊月里，他们踏着三尺深的积雪，前往晓庄。半路上，运载道具的大车翻倒在沟里，大家用绳拉、用手推、用肩扛，好不容易才把车子推上大路，一身汗一身泥一身雪地到了晓庄。师生们在犁宫前搭起了临时的舞台，南国社演出了田汉创作的《卖花女》、《苏州夜话》、《湖上的悲哀》等剧，学生和农民们看得如醉如痴。陶行知受此启发，遂带领大家成立了“晓庄剧社”，亲自担任社长，自己写剧本并和学生们一起彩排表演。他还带领着晓庄剧社，到镇江、无锡、上海、杭州等地演出，颇受好评。

陶行知在创办晓庄师范学校的过程中，曾感慨道：“教育的计划、方法都是次要的，那超过一切的条件，是同志们肯不肯把整个的心都献给乡村人民和儿童，真教育是心心相印的活动，唯独从心里发出来的，才能打到心的深处。”

在母亲六十大寿那天，陶行知在南京专门给在北京的母亲写了一封信：《送给国家的寿面》，信中说：“儿从母亲寿辰立志，决定要在这一年当中，于中国的教育上做一件不可磨灭的事业，为吾母庆祝，并慰父亲在天之灵。儿起初只想创办一个乡村幼稚园，现在越想越多，想把中国全国乡村教

育一齐都要立它一个基础。儿现在全副的心力都用在乡村教育上，要叫祖宗及母亲传给儿子的精神，都在这件事上放出伟大的光来。儿自立此志以后，一年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日；一日之中，务求不虚度一时。要叫这一年的生活，完全地献给国家，作为我父母送给国家的寿面，使国家与我父母都是一样的长生不老。”



在兴办学校的同时，陶行知并没有忘记关心时事，关心祖国的命运。自 1927 年开始，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先后集中兵力对共产党的中央苏区实行“围剿”，一时间，炮声阵阵，战火连连。陶行知对这种做法非常不满，于是化名“不除庭草斋夫”，在《申报》上连续发表了大量杂文和时评，其中，他在著名的《剿匪与造匪》等三篇时评中直截了当地指出：“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蒋介石看到陶行知的时评，大为恼火，于是下令“《申报》禁止邮递”。为了报馆的生计，《申报》总经理史量才不得不俯首认错，表示今后不再登“不除庭草斋夫”的文章，蒋

介石这才解除禁令。

不仅如此，而且 1930 年春，南京发生了和记洋行的中国工人无端被英国人打骂的恶劣事件，晓庄师范学校的全体师生为了抗议这种暴行，举行了大型的游行示威活动。这本来是维护中国人尊严的正义事件，但是此时蒋介石正忙于争夺权力的“中原大战”，蒋介石的对手正是和陶行知有过私交的冯玉祥。蒋介石遂认为陶行知此时的游行示威是响应冯玉祥反对自己的行动，于是，1930 年 4 月，开办三年的晓庄师范学校，被蒋介石以培养闹事学生为由密令停办。蒋介石派出 500 军警强行封闭了南京郊外的晓庄师范学校，并以勾结叛逆、图谋不轨的罪名，将陶行知列为国民政府的通缉要犯。陶行知得知此消息后悲愤交加，立即撰写了《护校宣言》，他抗议道：“晓庄的门可封，它的嘴不可封，它的笔不可封，它的爱人类和中华民族的心不可封。”

然而，一纸慷慨激昂的文书怎么能抵挡得住国民党的武力？南京卫戍司令部发出勒令解散的公告后，随即派数百名武装军警，包围了晓庄师范学校。他们一个个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从两边向学校包抄过去。他们谎说已接到上级的命令，晓庄聚众千余，有枪数百支，准备武装暴动，将包围歼灭之，如有反抗，格杀勿论。

晓庄师范学校一片肃杀之气，军警占领了晓庄师范学校，学生们没有了聚众活动的地点，陶行知只得和大家告别。

陶行知为之奋斗了好几年的晓庄师范学校，就这样被毁于一旦。无奈之下，陶行知在友人的帮助下先后在上海和日

本避难，他的教育事业就这样陷人了低潮。

晓庄师范学校被勒令停办后，原来的教师已不能回学校授课，而小孩子们非常厌倦私塾的老先生们，在这种情况下，有很多同学便行动起来，自己做校长、教员，自己教，自己学，自己办，还自称“自动学校”。陶行知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写了一首诗去祝贺他们：“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学校被关给陶行知带来的打击不小，而这个时候自己家里也传来噩耗，妹妹文渼不幸病故，而自己的妻子也得了重病，这对于原本已经非常贫困的陶家，无异于雪上加霜。这年夏天，逃亡上海的陶行知，强忍着内心的痛苦，为了自己钟爱的教育事业和伟大理想，和来到上海的晓庄师范学校的师生们举行了系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的主题是检讨晓庄师范学校过去四年的教学工作和商定以后的对策。在会上，大家畅所欲言，提出了三种意见：有部分人提议停止办学，到农村去发动最广大的群众来开展基层斗争；一部分人主张去联合知名人士，去和政府交涉，以求恢复晓庄师范学校；还有部分人主张，不应该废弃辛苦经营的教育果实，而应在其他地方继续兴办晓庄式的学校。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通过了第三种主张，陶行知为此写信给冯玉祥和熊希龄等人，还派人去北京活动。

在这次座谈会上，陶行知还提出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是实际的革命者，我们已经打了一回仗，但我们没来得及回敬对方，就溃败下来。我们今后不能坐在书房里计划或理想些什么，也不能再一点一滴地从一个村一个乡来做试

验了。中国革命要成功，非三万万四千万农民起来不可。”他的这个观点，和中国革命取得成功的理论完全契合。

但是，这种理论还未经实践，国民党政府就派人来上海追捕陶行知。被逼无奈的陶行知，只好在内山完造等人的帮助下，去日本逃难。在日本，他又到处考察，了解日本的教育，并参观日本的工业。通过对日本的考察，陶行知得出结论：“日本之所以发达，是强在它们的科学。”在日本将近一年的科学考察使得这个中国人大为震撼，他不顾个人安危，毅然返回祖国。回国后的陶行知，发起了轰轰烈烈的“科学下嫁”运动，他期望通过教育这种手段，以最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最广大的老百姓介绍科学知识。

1931 年，41 岁的陶行知在上海创办了“自然科学园”、“儿童科学通信学校”，并和当时的教育家丁柱中、高士其等人编辑了《儿童科学丛书》、《大众科学丛书》，他还特地创作了《儿童之歌》、《乌鸦歌》等儿童书籍。在《儿童之歌》中，陶行知提倡儿童要做“小盘古”、“小孙文”、“小牛顿”、“小农人”、“小工人”，并且要“开辟新天地”、“打倒帝国主义”，要“造‘富的社会’，不造‘富的个人’”，其崇尚科教的思想跃然纸上。

不仅如此，陶行知还提出“玩科学把戏”的生动口号，亲自去上海很多小学做化学、物理实验。

1932 年的一天，陶行知在做电池试验时深受启发。他发现以往的教学方法有一个重要缺点，就是没有把行动和思想连接起来，这就像没有用铜丝把电池的正负极连接起来一样，其结果肯定是发不出电流。于是，长期融会于陶行知头

脑中的“教学做”合一的教学思想全程被贯通起来了，随后，他创作了脍炙人口的《手脑相长歌》：

> 人生两个宝，双手与大脑。用脑不用手，快要被打倒。用手不用脑，饭也吃不饱。手脑都会用，才算是开天辟地的大好佬。

《手脑相长歌》语言朴实，内容通俗，非常符合儿童的口语习惯，因此，一创作出来便得到广泛的传播，几乎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陶行知用这首诗歌，主张教育要同社会实际生活紧密相连，把“教”、“学”、“做”结合起来，既教授，又要学习，还要实践，这样才能增长知识。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结晶。



这年的10月1日，上海宝山大场附近，又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山海工学团”正式诞生，这种新型教育方式的创造者正是陶行知。“工学团”是陶行知发明的一种半工半学的模式，主要是把孩子们三五成群地集结起来，边学习，边劳动。“山海工学团”提出了“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口号，将工地、学校、社会连成一片，进行军事训练、生产训练、民权训练、生育训练等。

孩子们读书不用花钱，办学经费依然靠陶行知去募集。通过一段时间的发展，“山海工学团”的成员慢慢从孩子扩展到成人，陶行知为种棉花的妇女、流浪儿、报童、工厂女

工办“工学团”和识字班，上课地点就设在某户人家的亭子间，由于免费读书，因此学生规模很快就达两万余人，并在全国20多个省区推广开来。

在“山海工学团”之后，陶行知又陆续创办了“晨更工学团”、“劳工幼儿团”等，开展“即知即传”的普及教育运动，甚至推出了教育史上最经典的“小先生运动”，这些教育形式很快传及全国甚至东南亚。

“小先生运动”又称“小先生制度”，是陶行知在普及教育实践中独创的方法，采取以小孩教小孩、小孩教大人的方法推广实施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

陶行知认为，成年人是需要普及文化知识教育的主要对象，而“小先生”要负起普及的使命，为此“小先生”要找到这样的“学生”。陶行知说，“小先生所要找的学生是不能上学的人或不能常到团本部来学习的人”，因此“要到传统学校或团本部之外去找他的学生”，这样就打破了过去教育只被少数人占有的情况，从而拓展了大众参与成人教育的机会。

在后来的《纵谈战时各种教育问题》一文中，陶行知谈及“小先生制度”时说道：“‘小先生’是儿童向别人传授知识的一种形式。‘小先生制度’的出现有个过程。最初是学校里的小孩自愿地帮助他们家里的人和邻居去学自己刚学到的知识，随后街道上的小孩也将所学的知识传递给他们的朋友。‘小先生’首次给人的启示，是在十四年前。当时我的母亲五十七岁，她突然产生了学习的兴趣。她要求念我给家里写的信，并且想了解世界上发生的一些事情。那时唯

一可能帮助她学习的老师，是只有六岁的我的第二个孩子，他已读完第一册课本。祖孙二人一块游戏和念书，一个月内，我的母亲学完了第一册。这件愉快的事情并未引起我们全家以外人的热情关注，但事实说明，一个六岁小男孩没有师范学校文凭，也没有高等院校毕业证书，居然成功地教一位五十多岁的老祖母读完了第一册课本，这给了我一个非常深刻的启示，也便萌生了‘小先生’的念头。”

这年43岁的陶行知，还做了一件颇有意味的事情：他在当时的《生活教育》上发表了《行知行》的文章，认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正式改名为陶行知。他从“行知”中悟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的道理，并且终生自勉。

经过这段时间的教育实践，陶行知的生活教育理论又有了新的发展：开始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运动和文化运动的影响。1933年春，陶行知总结了晓庄师范学校的经验教训，结合这些年的教育实践，认识到要改造旧中国，单靠农民是不行的，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要结成工农联盟。于是，他将1927年创作的《锄头舞歌》作了修改，在内容中加上了“光棍的锄头不中用，联合机器来革命”一段，表明他已经充分认识到中国工人阶级的重要性。

从这时开始，陶行知开始陆续组织工人轮流到“山海工学团”进修。1933年的10月1日，“山海工学团”成立一周年之际，“工学团”倡导的“即知即传”的观点已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山海工学团”在无锡、南京等地得到了广泛的发展，这使得陶行知大受鼓舞。就在他为“工学团”取得的成绩高兴的时候，又有不幸的消息传来：陶行知的母

亲去世。陶行知得知这个消息，嚎啕大哭，急忙赶回家奔丧。陶行知非常感激母亲的养育之恩，母子关系情深，但在丧事的办理上，他依然坚持节俭原则，草草办理了母亲丧事，为“工学团”节约了一笔资金。

办完丧事后，陶行知又返回“工学团”，他决定更加积极地兴办融人工人阶级的工学教育。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们必须聚精会神地创造出一个真正工人的幼儿工学团。这事虽然由我们发动，但主体是工人，管理权须在一年之内转移到工人的手中。”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吞并了中国的东北，之后又继续侵略华北，妄图消灭中国，中华民族面临着最严重的民族危机。在这种形势下，1935 年 8 月 1 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了名为《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的宣言，这就是著名的《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我进攻，南京卖国政府步步投降，我北方各省又继东北四省之后而实际沦亡了！……有无限富源的直、鲁、晋、豫各省，有最重要战略意义的察、绥区域……不到四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长此下去，眼看长江和珠江流域及其他各地，均将逐渐被日寇所吞蚀。我五千年古国即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四万万同胞将都变成亡国奴。宣言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一经发表，就在北平、上海等大城市迅速传播，然后很快传遍全

国。许多学生读到这个宣言后，“如濒临死亡的人突然获救一般，高兴得夜不成寐”，“觉得政治上有了方向，目标明确，行动更坚决了”。

身在上海的陶行知在《八一宣言》的感召下也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特别是在“一二·九”爱国运动爆发后，他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胡愈之、邹韬奋、李公朴等爱国人士发起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支持组织了“新安旅行团”，倡导大众歌曲和大众唱歌团，推行国难教育。陶行知被选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的执行委员，他并发表二次救国运动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共赴国难”等主张，成为上海救国运动和国难教育的领袖之一。



1936 年是“一·二八”事变的四周年纪念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主席团成员沈钧儒、黄炎培、陶行知、何香凝、王道时等 19 人，在上海发起了一次大集会，并在会后举行示威游行。陶行知等人带领近万人向宝山庙进发，祭扫抗日无名英雄墓。

“山海工学团”的师生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活动，每个人都非常热情。由于在校内时早已做好了思想动员，所以在整个活动中，师生始终精神饱满，步调一致。参加这次活动的师生大约有 40 人，其中包括教师马绍贤、张家域、郑先文、陈光宇等，学生有俞华、徐祥先、沈增善、徐文达、赵之

敏、徐汝年、张耀祖、毛申囡、沈玲宝、奚顺根、桂家月、孟根根、沈一飞等人，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他们的爱国热情。

活动结束后，“山海工学团”的老师们因势利导，又组织了一次赴大场镇的游行活动。全校师生和部分农民共500余人参加了这次游行。他们在游行中上演抗日戏、散发抗日传单、唱抗日歌、呼喊抗日口号，极大地调动了周边人民群众的抗日热情。

为了把生活教育运动和抗日结合起来，陶行知又发起成立了“国难教育社”，拟定了《国难教育方案》。他在《国难教育方案》中指出：“国难教育方案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保卫中国的领土完整，以争取中华民族的自由平等。”

1936年5月，陶行知和宋庆龄、何香凝、沈钧儒等人，又在上海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执委和常委。陶行知与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等人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宣言，主张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8月10日，毛泽东发表了《论团结御侮，复章、陶、邹、沈四先生的信》，表示愿意在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上签名，认为这是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最真实的意见与要求。

1936年7月，陶行知受救国会派遣，出访欧、美、亚、非28个国家，宣传中国人民的抗日救国主张，联合华侨，募集物资，并介绍中国大众教育运动。与此同时，他的结发妻子汪纯宜孤苦地死在了精神病院，四个孩子也天各一方，杳无音信。他为了大爱而舍弃了家庭的小爱，这远非常人所

能做到。

这年，陶行知接到在伦敦召开的“世界新教育会议”的邀请，出席了第七届年会。在年会上，陶行知全面地介绍了中国的“小先生制度”和其他教育模式，受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甚至连甘地都邀请陶行知去印度推广这种“小先生制度”教育方法。这次会议后，陶行知又和钱俊瑞一起到比利时参加了在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并当选为中国执行委员。在世界和平大会上，陶行知为中国的抗日爱国运动积极奔走，得到了世界人民的支持。

正当陶行知以教育家和全国各界救国会领袖的身份出访欧美，向世界报告中国文化运动和救亡运动的情况，考察新教育的时候，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民间抗日救亡运动的“七君子”被捕入狱：

这年的 11 月，在上海日商纱厂中国工人举行的罢工斗争中，救国联合会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对罢工斗争予以大力支持。23 日，南京政府以“危害民国”等罪名在上海将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七人逮捕。南京政府命令江苏高等法院罗织十条罪状，向被告“七君子”提起公诉。当陶行知得知沈钧儒等“七君子”被捕的消息后，十分气愤，立即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组织营救“七君子”。

“七君子”被捕后，救国会的《救亡情报》号外刊登了七人被捕的消息，此后《立报》、《大美晚报》等亦纷纷转载，“七君子”事件迅速传遍全国。宋庆龄、何香凝等 16 人又发起了救国入狱运动，积极营救“七君子”。在各方的

努力下，沈钧儒等七人终于被释放出狱。

陶行知到美国后，立即和美国的洗衣工会取得了联系，得到了洗衣工会的支持，他把宣传抗日的卡片放在洗好的衣服里进行抗日宣传。此外，他还带领留美学生团四处演讲，与旅美华侨取得联系，成立联络组织，负责国外联络与团结华侨抗战救国工作。

5月4日，在洛杉矶5000人集会上，针对美军火商卖给日本武器所需原料时，陶行知大声疾呼："日本在中国杀死一百万人的时候，有一半是美国军火商帮助杀死的！"他提议"凡是不愿做帮凶的人请站起来"，所有人都起立，表达禁运的决心。这个活动取得极大的反响，推动了美国禁止向日本运输军火原料的决心。

这个时候，日本军队为了全面占领中国，在不停地伺机寻找借口。1937年7月7日晚上，驻守在卢沟桥的日本军队没有通知中国方面，就在中国驻军附近举行"军事演习"，并称有一名日军士兵失踪，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一要求，日军就向卢沟桥一带开火，中国守军第29军予以还击，震惊中外的"七七事变"发生。

"七七事变"发生后，陶行知把"国难教育运动"改名为"战时教育运动"，提出战时教育运动的目标是："在战时的组织中进行教育，组织民族起来参加战时教育。"为适应抗战形势，"山海工学团"停办，成立战地服务团，由张劲夫任团长，还让从延安来的共产党人余立金任军事委员。



1937年8月27日，陶行知离开美国去墨西哥。在墨西哥进行了短暂的抗日宣传后，又马不停蹄地返回美国。一回到美国，陶行知立即发出抵制日货的呼吁，他大声疾呼："即使你买一块钱日货，那都是在帮助日本杀中国人!"陶行知在写给后来的第二任妻子吴树琴的信中说："有三件事情决定日本必败：一、中国的联合和持久的抗战；二、日本国内民主力量的兴起；三、全世界各个国家对日本道义上的谴责和经济封锁。"随后，他又去加拿大，被邀请出席国会，他在加拿大到处演讲"中国的战争"等问题，在"中国的战争"中阐述了"反共借口剖视"、"西安事变的意义"

等问题，还在加拿大介绍“小先生制度”。

陶行知在欧美各国的频繁活动还包括一个重要事件，即“五人宣言”。1937 年 12 月 12 日，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也不幸沦陷，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陶行知代自己的老师杜威起草了给甘地、罗曼·罗兰、罗素和爱因斯坦的电报，过了两天这五个人联合发表宣言，一致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谴责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战争和对中国平民的残忍杀害，呼吁对日本禁运。这五个人中，杜威是享誉世界的教育家，甘地是印度最伟大的政治家，罗曼·罗兰是法国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罗素是英国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历史学家，爱因斯坦是 20 世纪世界最伟大的科学家。这五个人的宣言一经发表，就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巨大的响应，爱好和平的人们，纷纷支持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战争。“五人宣言”发表后，陶行知又赶到美国的码头，他极力劝说美国码头工人罢工，还劝他们不要向日本运输废钢铁。他说，如果那样，虽然美国的富翁赚到了钱，但中国同胞将血流遍地，这赚的是昧心钱。

山河破碎，生灵涂炭，中国到处一片衰败的景象。殊不知，在逃难的路上，在茫然不知所终的人流里，还有陶行知自己的孩子。当时，陶行知 18 岁的二儿子陶晓光带着 13 岁的陶城，沿着长江从上海逃到了武汉。17 岁的三子陶刚，则历经磨难，从家乡徽州翻山越岭，经广西、贵州等省，最终徒步到了重庆。

陶行知在写给儿子晓光的信中写道：“要把生命的火药装在大炮里对准日本帝国主义轰炸。倘若把生命的火药放在

爆竹里玩掉或者是在沙盘里浪费掉，那真是太可惜了。”可见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憎恨和对国家现状的痛心。虽然远在国外，但他对中国的抗日运动比任何一个中国人都要关心。自1938年4月开始，他又去西雅图、旧金山、华盛顿、波士顿、哥伦比亚、维多利亚等美国及拉美城市进行演讲和呼吁，大力宣传抵制日货和支持中国抗日战争的运动。

同年7月，陶行知又赶往德国，在纪念“七七事变”的会议上，他说：“七月七日是中华民族创造历史的又一章，是打破日本妄想，打破世界的误解的开始。”随后，他又赶往维也纳、布达佩斯、雅典等地宣传抗日。

此时国内的局势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召开的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了成立国民参政机关的建议，国民政府遂公布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7月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大会通过了《拥护抗战建国纲领案》等决议案，远在国外的陶行知也被聘为第一届参政员。

8月，在海外漂泊两年多，在欧、美、亚、非28个国家和地区都留下了足迹和正义呐喊的陶行知终于回国。他在国外的两年多时间里，谴责日本的侵略，动员大量海外华侨和各国人民支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极大地支援了国内的正义战争。在香港友人组织的欢迎大会上，他讲了自己的三个愿望：“一是创办晓庄学院，培养高级专门人才；二是创办儿童难民学校，培养小人才；三是在香港创办职业补习学校，通过教育的方式发动香港和海外的同胞投入抗日战争。”

他在9月1日香港文化界举行的欢迎会上发表了《国际形势与中国抗战》的演讲，分析了世界反法西斯斗争，号召“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他在之后的香港第四届妇女联合会上作了致辞后没多久，香港中华业余学校就宣告成立，他的第三个愿望实现了。香港中华业余学校秉承晓庄师范学校的理念，强调学校是“师生共有的，推而广之，也可以说是社会共有的”。学校开设文学、新闻、外语、民运、教育等科，还聘请金仲华、刘思慕、茅盾、欧阳予倩、吴涵真、方与严等学者授课。这所由陶行知自己担任董事长的中华业余学校是名副其实的战时社会大学，不但让工人们学到了知识，而且有力地支持了国内的抗日战争。

到国内之后，陶行知看到成千上万的人才幼苗在战争中枯萎，心里非常痛苦。这样，建立一个专门招收难童和孤儿的学校的构想在陶行知的心中形成，这也是他的“三个愿望”的第二个。虽然身处一个物质生活极为困难的年代，但他仍坚定地给宋美龄写信提出创办孤儿学校的计划。然而，国民政府赈济委员会只批准给予开办费，而其他日常花费要陶行知自行筹集。

即使这样，陶行知依然决定独自创办学校，因为他深知这些孩子是祖国的未来。其中，在一家保育院里的一幕，给了他很深的触动。陶行知在一家保育院里看到一群孩子在一个头上长满癞疮的难童的指挥下欢快地歌唱，他被这个孩子的乐观与音乐才华打动，就将他选到自己的学校，并让冯玉祥将军请了最好的医生治好了他的癞疮，后来这个孩子成为了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著名的指挥家。

提及自己在保育院的见闻，陶行知后来回忆说：“我在重庆临时保育院参观，院长告诉我一件令人愤愤不平的事。他说近来有不少的阔人及教授们来挑选难童去做干儿子，麻子不要，癞痢不要，缺唇不要，不管有无才能，唯有面孔漂亮，身材秀美，才能中选。而且当着孩子的面说，使他们蒙上难堪的侮辱，以至在他们生命中，烙上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他还说：“选干儿子的做法，应变为培养国家民族人才幼苗的办法，不管他有什么缺憾，只要有特殊才能，我们都应该加以特殊之培养，于是我便生发创办育才学校的动机。当时就做了一个计划，由张仲仁先生领导创立董事会，并且得到赈委会许俊人先生之同意而实现。”这样，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又诞生了……



1939年7月20日，育才学校在重庆附近的合川县成立，陶行知出任校长，至此，当初的三个愿望都变为现实。陶行知从收留的15省流亡的难童中，择优录取了具有特殊才能的孩子150多人入学。育才学校培养的目标是："引导学生团结起来做追求真理的小学生，团结起来做自觉觉人的小先生，团结起来做手脑双挥的小工人，团结起来做反侵略的小战士。"学校按学生的特长开设社会、自然、文学、美术、音乐、戏剧、舞蹈七个组。这个偏僻的县城当年离重庆有着150里崎岖的山路，还有嘉陵江的激流阻隔，但这些无法阻挡陶行知和学生们的满腔热情，陶行知为育才学校请来

了最好的老师：作曲家贺绿汀教音乐，戏剧家章泯教戏剧，文学组主任是诗人艾青，教孩子们舞蹈课的是戴爱莲，抗战时聚集在重庆的文化名人和艺术家们都跋山涉水到育才学校讲课。



育才学校

育才学校地处穷乡僻壤，物质条件差，怎么请得动、留得住这么多的名人来校服务呢？这是因为当时中华民族都在抗战，这些艺术家把投身育才学校，培养有为少年视为献身民族救亡的实际行动，所以纷纷来到育才学校义务授课。而陶行知善用人才，能团结大家共同奋斗，使得育才学校的教职员工都能各得其所、各尽所能地甘愿贡献自己的力量与才智。

在育才学校曾经教过课的历史学家翦伯赞曾经回忆说：

“十几岁的孩子，能够在座谈会上面谈时局，从国内到国外，从政治到军事，了如指掌；能够写出作品、自编剧本，自己作曲、作歌；能够写生，能够画出星宿的图谱，这是抗战中的中国的奇迹。”

战乱不断，日本人飞机不停地轰炸重庆，物资非常紧张，使得育才学校常买不到能吃的米，由于没有政府的支持，陶行知常常筹不到钱，使得育才学校经常陷入困境。有学生回忆：“最困难的时候，学生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菜则是胡豆、藤藤菜，还有豆渣。”看着孩子们饿肚子，陶行知当然非常难受，一次他在睡梦中听见谷子在仓里叫，遂写了一首诗，15 岁的学生陈贻鑫流着泪，为校长的诗谱曲：“谷子在仓里叫，日寇在战场上笑，我们要给难童吃下去……”

师生们食不果腹，育才学校一度濒临绝境。为了学校两百多号“活菩萨”的生计，陶行知无奈之下只得四处化缘，每天在往返重庆城里的山路上同柴米油盐赛跑。他的儿子陶城回忆说：“父亲下雪天冒着雪，下雨天冒着雨，有时跑了一天，到晚上十二点钟才回来。”外出化缘的他每天只吃两个烧饼充饥，穿着一身破衣裤，心里牵挂的却是孩子们每天都有饭吃，每人能有一套像样的衣服。

在最苦难的岁月里，陶行知饱尝了办学的艰辛，他自己曾作了一首诗，诗是这样写的：“朝朝暮暮，快快乐乐；一世到老，四处奔波；为了苦孩，甘为骆驼；于人有益，牛马也做。”表达了乐观的革命情怀。

陶行知的不懈努力，终于有了回报，东南亚和美国的华

侨知道育才学校的物质条件如此紧张，都纷纷捐款捐物。不仅如此，育才学校的创办还得到了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高度重视和大力支持。周恩来对陶行知和育才学校全体师生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和邓颖超亲临学校，给育才学校的师生作形势报告，并题词“一代胜似一代”，还派人送给学校400元，作为教学费用。

抗战困难时期，几乎是陶行知一个人靠四处募捐养活着这个有400多人的学校，有人劝他，说他这是抱着石头游泳，他却说：“我是抱着爱在游泳。”

他的夫人吴树琴说：“他身上的衣服有两个袋。他说，我这个袋是放公家的钱，另一个袋是放私人的钱。募捐来了以后都不是他自己去取钱，他是事先写信，然后让学生去拿来以后，当时就交给陶先生，陶就交给学校管钱的人。他是公私分明得很，一分钱都不会挪用的。”

陶行知本身就是教育家，他在创办育才学校的时候，提出了“活”的教育理论。他说：“我们要解放小孩子的空间，让他们去接触大自然中的花草、树木、青山、绿水、日月、星辰以及社会中之士、农、工、商、三教九流，自由地对宇宙发问，与万物为友，并且向中外古今三百六十行学习。”他还进一步指出：“创造需要广博的基础，解放了空间，才能搜集丰富的资料，扩大认识的眼界，以发挥其内在之创造力。”这其中，关于陶行知活用教育方法的事例有很多，其中流传最广的是下面“四块糖果”的故事。

一天，陶行知在校园看到学生王友用泥块砸自己班上的同学，当即便喝止了他，并让他放学后到校长办公室来一

趟。大家都以为陶行知是要好好“教育”一下这个学生。

放学后，陶行知回到校长室，发现王友已经等在门口准备接受“惩罚”了。陶行知却掏出一块糖果送给王友，并说：“这是奖给你的，因为你按时来到这里，而我却迟到了。”王友惊疑地接过糖果。随后，陶行知又掏出一块糖果放到他手里，说：“这第二块糖果也是奖给你的，因为当我不让你再打人时，你立即就住手了，这说明你很尊重我，我应该奖你。”王友更惊疑了，他眼睛睁得大大的。

陶行知又掏出第三块糖果塞到王友手里，说：“我调查过了，你用泥块砸那些男生，是因为他们不守游戏规则，欺负女生；你砸他们，说明你很正直善良，且有批评不良行为的勇气，应该奖励你啊！”王友感动极了，他流着眼泪后悔地喊道：“陶……陶校长你打我两下吧！我砸的不是坏人，而是自己的同学啊……”

陶行知满意地笑了，他随即掏出第四块糖果递给王友，说：“为你正确地认识错误，我再奖给你一块塘果，只可惜我只有这一块糖果了。我的糖果没有了，我看我们的谈话也该结束了吧！”说完，他就走出了校长室，而那个叫王友的学生以后再也没用泥块砸学生了。

如今“四块糖果”的故事已经成为教育经典，启发着千千万万的教育工作者。有教育工作者是这样解读这个“四块糖果”的故事：

第一块糖奖励他按时来到办公室。陶先生用第一块糖拉近了与学生之间的心灵距离：把学生当人看，给学生完整的人格，让他们感受到老师对他们的爱。

第二块糖奖励学生能及时住手。陶先生说这是那个学生对自己的尊重，其实这更是陶先生对王友的尊重，让王友有了一种被尊重后的幸福感。如果说第一块糖是让学生不再惧怕，那么第二块糖就让他们心灵距离更近了，也便于下一步的相互交流。

第三块糖奖励学生能保护女生。陶先生对王友的打人行为不但不惩罚，反而给予“奖励”，让王友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说明王友已经彻底与以前的他划清了界线，已经有了忏悔和自责之意。“治人需治心”，到了这里，陶先生的教育艺术已经达到了顶峰。

第四块糖奖励学生能改正错误。当王友已经后悔到极点的时候，这时改正错误成为他必须要做的事情。陶先生奖励他第四颗糖之后，不用再说明王友的错误在何处，王友已经深刻认清了自己的错误，事实上他以后也没有再犯这样的错误。

陶行知先生对打架事件的处理，值得后世所有的老师学习。教育不是改变的过程，而且引领的过程，以最佳的教育方式，让孩子自悟其理比强制要求更为重要。



“四块糖果”的故事，可以看出陶行知终其一生始终坚持的教学理念。这个理念，他在《育才学校创办旨趣》中说得很详细：“我们的学生要过这样的集体生活，在集体生活中，按照他的特殊才能，给予某种特殊教育，如音乐、戏剧、文学、绘画、社会、自然等。以上均各设组以进行教育，但是小朋友确有聪明，而一时不能发现他的特长，或是各方面都有才能的，我们将来要设普通组以教育之。又若进了某一组，中途发现他并不适合那一组，而对另一组更适合，便可以转组。总之，我们要从活生生的可变动的法则来理解这一切。

但是，育才学校有“三个不是”，须得在此说明：

（1）不是培养小专家。有人以为我们要揠苗助长，不顾他的年龄和接受力及其发展的规律，硬要把他养成小专家或小老头子。这种看法是片面的，因为那样的做法也是我们极力反对的。我们只是要使他在幼年时期得到营养，让他健全而有效地向前发展。因此，在特殊功课以外，还须给予普通功课，使他获得一般知识，懂得一般做人的道理，同时培养他的特殊才能，根据他的兴趣能力引导他将来能成为专才。

（2）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有人误以为我们要在这里造就一些人出来升官发财，跨在他人之上，这是不对的。我们的孩子们都从老百姓中来，他们还是要回到老百姓中去，以他们所学到的东西贡献给老百姓，为老百姓造福利；他们都是受着国家民族的教养，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贡献给整个国家民族，为整个国家民族谋幸福；他们是在世界中呼吸，要以他们学得的东西帮助改造世界，为整个人类谋利益。

（3）我们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干这特殊的教育。其实我们不但没有丢掉普及教育，而且正在帮助发展它。现在中国正处在伟大的抗战建国中，必须用教育来动员全国民众觉悟起来，在抗战建国纲领之下，担当这重大的工作，所以普及教育，实为今天所亟须。要继续不断地协助政府，研究普及教育之最有效方法，以提高整个民族的意识及文化水准。育才学校之创立，只是生活教育运动中的一项新发展的工作，它是丰富了普及教育原定的计划，绝不是专为这特殊教育而产生特殊教育，也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来做特殊

教育。”

育才学校不是培养小专家，不是培养他做人上人，不是丢掉普及教育，而干特殊的教育，所以，陶行知明确提出：“一切所教所学所探讨，为的都是人民的幸福。”他说：“创办育才的主要意思在于培养人才之幼苗，使得有特殊才能者的幼苗不致枯萎，而且能够发展，就必须给予适当的阳光、空气、水分和养料，并扫除害虫。我们爱护和培养他们正如园丁一样，日夜辛勤地工作着，希望他们一天天地生长繁荣。”

育才学校坚持的是“生活教育”的理论。陶行知在《战时教育》上发表题为《谈生活教育》的文章时，概括出了生活教育理论的要点：“从定义上说，生活教育是给生活以教育，用生活来教育，为生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从生活与教育的关系上说，是生活决定教育。从效力上说，教育要通过生活才能发出力量成为真正的教育。……‘社会即学校’这一原则要把教育从鸟笼里解放出来。‘即知即达’这一原则是要把学问从私人的荷包里解放出来。‘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是教人从源头上去追求真理。工学团或集体主义之自我教育是在团体生活里争取自觉之进步。‘教育是民族解放、大众解放、人类解放之武器’这种教育观是把教育从游戏场、陈列室解放出来，输送到战场上去。”

陶行知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陶行知经常组织育才学校的师生和当地的农民交朋友，并到当地煤窑、印刷厂、水泥厂或参观或劳动。他还开展教农民识字、唱革命歌

曲和宣传时事等活动。每当这些活动开展时，陶行知常主动引导学生接近这些实实在在的劳动人民，让学生们调查研究，培养他们做群众工作的能力。日子一久，当地的人们很快消除了对育才学校师生们的误解和矛盾，还经常和学校的师生们来往，参加育才学校组织的很多活动。甚至有的学生过生日，还有农民送来鸡蛋，表示祝贺。

除了生活教育外，陶行知也很重视对学生的思想和人格的塑造。育才学校的学生实行自治原则，提倡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师生团结，尊敬师长，遵纪守法，讲究礼貌。学校后来陆续制定了《育才十二要》、《育才学校之礼节与公约》、《育才卫生教育二十九事》等条例和要求。《育才十二要》规定了育才学校全体师生必须遵守的十二项基本守则，为朝气蓬勃的师生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育才学校为陶行知也赢得了不少荣誉。当时国民政府颁布的《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第三条规定："曾在各种重要文化团体或经济团体服务三年以上，著有信望，或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得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陶行知以"文化团体和努力国事、信望久著之人员"身份，连任两届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但是，开会的时候，他都坚持步行往返，把政府每月补助的300多元的车马交通费硬生生地省下来，作为育才学校的教学经费。他把一切都献给了育才，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对身边的人也是如此。

有次，陶行知发现当年晓庄学校的学生马侣贤给自己的儿子马晓光开的学历证书有不合实际的地方，立刻发电报追回了这个证明。然后，他写信给马晓光，在信中说：

“我们必须坚持‘宁为真白丁，不做假秀才’之信条，宁可失去工作和学习的机会，也绝不向黑暗的社会学习与妥协……‘追求真理做真人’，你记住这七个字，将终身受益无穷。”



1941年9月，陶行知为试验“育才幼年研究生制”，特地选拔了27名少年研究生进行专门培养。第二年，育才学校正式成立小学部，学生是年龄小而未显露专业才能的难民儿童以及重庆当地的孩子。但是，随着世界法西斯侵略的加深，太平洋战争爆发，东南亚华侨对育才学校的支援中断。育才学校的办学经费又陷入困境。陶行知一面号召师生团结起来，互相帮助渡过难关，另一面又为经费继续奔忙。他在写给儿子陶晓光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有两位朋友，一是贫穷，二是患难。”他还不无风趣地说：“整个教育理论都是它们抚养起来的。”他用六个字勉励育才学校的师生

们："友穷，迎难，创造。"

1942年7月1日，在育才学校成立三周年的纪念演讲中，陶行知鼓励全校师生要"在磨难中前行，在磨难中继续创造"，并且作了《每日四问》的重要演讲。他在演讲中说：

"首先，我们每天应该要问的，是自己的身体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

我们必须继续建立健康堡垒。要建立健康堡垒，必须注意几点：科学的观察与诊断；饮食的调节与改进；预防疲劳的休息。希望大家时时提示警觉，预防疲劳。天天能在兴致勃勃中工作学习，健康必然在愉快中进步了。

其次，我们每天应该问的，是自己的学问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

现在我想到五个字。第一个，是'一'字，'一'是专一的一；第二个，是'集'字，'集'是搜集的集；第三个，是'钻'字，'钻'是钻进去的钻；第四个，是'剖'字，'剖'是解剖的剖；第五个，是'韧'字，'韧'是坚韧的韧。

再次，我们每天要问的，是自己担任的工作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

第一点是要'站岗位'；第二点是要'敏捷正确'；第三点是要'做好为止'。

最后，我们每天要问的，是自己的道德有没有进步？有，进步了多少？

因为道德是做人的根本，根本一坏，即使你有一些学问

和本领，也无甚用处。没有道德的人，学问和本领愈大，为非作恶愈大……”

《每日四问》从身体、学问、工作和道德上对育才学校的全体师生作了要求，不但给当时育才学校学生们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参照，对后来的教育事业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

《每日四问》极大地鼓舞了育才学校的师生们。到了这年的 7 月底，育才学校的师生不但没有被物质条件的匮乏所打倒，而且还有很多创造，比如兴建了深湾游泳池、露天舞台、环校路等。不仅如此，育才学校的师生们还在儿童文学、剧本、舞蹈、歌曲、美术、史地材料、自然科学实验、科学仪器工具等方面也有很多创造，育才学校师生获得了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双丰收。

在教育艺术的殿堂里，陶行知这位长者不知疲倦，总想着把最好的教育交给学生们。他着手筹办育才工艺组，他称这是“工程师之苗圃”。1943 年 1 月 20 日，陶行知在重庆观看了话剧《安魂曲》后，大为感动。他感觉这出莫扎特的戏是学生们成才的“终身之课”，“在这出戏里，我们重新发现自己，会看见自己的苦难，自己的快乐，自己的创造和自己的命运”。所以，为了让育才学校的学生接受这样的教育，第二天，他专门派人到学校组织全体师生连夜步行 100 多里赶到重庆，观看了最后一场演出。

不仅仅是实地看话剧，陶行知还积极开办画展，他组织的画展里，常常能请到徐悲鸿、关山月、李可染等名人或者名人的画作，所以育才学校师生经常有与大师直接交流的机

会。为了落实画展，他甚至耽搁了回家给妻子过生日的机会。而让所有人感动的是，陶行知为了育才学校不停地奔波，自己的裤子破了都毫不在乎。他的新裤子还是冯玉祥看到了他的窘迫，送给他的。陶行知在给儿子的信中说："我现在编书吃饭，化缘兴学，乐趣不减当年。"

把最好的东西给学生们，并不等于对学生们是一边倒的溺爱。当他发现育才学校的师生有骄傲自满的情绪时，或在学习上停滞不前甚至稍有下降时，他总是用各种办法，提醒、鼓励他的学生们继续进步。为调动全校师生的创造力，克服骄傲自满情绪，他还创作了长篇散文诗《创造宣言》并亲自朗诵，在文中他写道：

"创造主未完成之工作，我们接过来，继续创造。

宗教家创造出神来供自己崇拜。最高的造出上帝，其次造出英雄之神，再其次造出财神、土地公、土地婆来供自己崇拜。省事者把别人创造的现成之神来崇拜。

恋爱无上主义者造出爱人来崇拜。笨人借恋爱之名把爱人造成丑恶无耻的荡妇来糟蹋，糟蹋爱人者不是奉行恋爱无上主义，而是奉行万恶无底主义的魔鬼，因为他把爱人造成魔鬼婆。

美术家如罗丹，是一面造石像，一面崇拜自己的创造。

教育者不是造神，不是造石像，不是造爱人。他们所要创造的是真善美的活人。真善美的活人是我们的神，是我们的石像，是我们的爱人。教师的成功是创造

出值得自己崇拜的人，先生之最大的快乐，是创造出值得自己崇拜的学生。说得正确些，先生创造学生，学生也创造先生，学生先生合作而创造出值得彼此崇拜之活人。倘若创造出丑恶的活人，不但是所塑之像失败，亦是合作塑像者之失败。倘若活人之塑像是由于集体的创造，而不是个人的创造，那么这成功失败也是属于集体而不是仅仅属于个人。在一个集体当中，每一个活人之塑像，是这个人来一刀，那个人来一刀，有时是万刀齐发。倘使刀法不合于交响曲之节奏，那便处处是伤痕，而难以成为真善美之活塑像。在刀法之交响曲中，投入一丝一毫的杂声，都是中伤整个的和谐。

教育者也要创造值得自己崇拜之创造理论和创造技术。活人的塑像和大理石的塑像有一点不同，刀法如果用得不对，可以万像同毁；刀法如果用得对，则一笔下去，万龙点睛……"

陶行知在散文诗中既间接批判了懒惰者和骄傲自满的思想，又鼓励学生们要有"大无畏之斧"、"金刚之信念与意志"，认定"处处是创造之地，天天是创造之时，人人是创造之人……让我们至少走两步退一步，向着成功之路迈进吧！"《创造宣言》在育才学校掀起了巨大的反思运动，育才学校的各组师生竞相举行"创造晚会"，以培养创造新风气。

随后，陶行知在创作的《育才学校校歌》中也强调了虚心的精神，他在《育才学校校歌》中写道："我们是凤凰

山的开垦者，要创造出新的凤凰山，新的家，新的学校，新的乐园，新的世界。我们要虚心、虚心、虚心，承认我们一无所知，一无所能。我们要学习、学习、学习，学习到人所不知，人所不能。我们要贡献、贡献、贡献，实现文化为公，天才为公。”“稳步前进，稳步前进，走到光明，迎接东升的太阳，得到光，得到热，得到力，创造幸福的新中国，新世界”。



一心办学育才，让陶行知交到不少进步人士做朋友，而陶行知对朋友，也是肝胆相照。1943 年 4 月，陶行知的朋友萨空了突然被捕。萨空了是当时非常著名的新闻记者，进步人士，先后在重庆任《新蜀报》总经理和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的总经理。

历史学家翦伯赞得知萨空了突然出现在重庆的北碚，并被剃了光头被人押解着做苦役的消息后，连忙告诉了陶行知。陶行知闻讯后心急如焚，他连夜联络沈钧儒等有影响力的进步人士，通过救国会向国民政府交涉，迫使重庆的特务机关不敢轻易处置萨空了。朋友们通过多种途径打听到萨空

了被关押在五云山顶戒备森严的“教导团”里，而且他13岁的小女儿苦荼也被关押在集中营。经过一番周折，陶行知终于把小苦荼接到了育才学校。见到小苦荼虱子疥疮满身，陶行知非常难过，赶忙安排校医为她治疗，还为她换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安排她到学校学习。当得知萨空了还有个失散多年的大女儿苦茶时，陶行知也多方托人帮萨空了找回了苦茶，也把她送进了育才学校。陶行知让苦荼学习她最喜欢的音乐，让姐姐苦茶进了社会组学习。这年6月，经社会进步民主人士的多番营救，国民政府被迫释放了萨空了。

不只萨空了的两个女儿，还有很多进步人士的孩子因为避难都来到育才学校学习，其中就包括李远芃。李远芃是革命烈士李硕勋的儿子，由周恩来、邓颖超亲自送到育才学校。陶行知了解到李远芃的家庭情况后，就激励他专攻社会科学以继承父亲的遗志。李远芃分到社会组后很快就对社会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常常和班里的同学谈论时事，发表很多独到的见解。李远芃后来改名李鹏，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务院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1984年他曾写下一段怀念恩师陶行知的话：“陶行知先生是我的老师，虽然我受他直接教诲的时间甚为短暂，但他的为人、思想、作风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感情之情确给我当时少年的心灵留下深刻的印象，使我受益匪浅。”

1944年7月24日，邹韬奋带着对祖国的无限眷恋和深情，离开了他毕生致力从事的伟大的爱国民主事业，年仅48岁。邹韬奋是我国卓越的新闻记者、出版家，“九一八事变”后他坚决反对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他主编的爱

国刊物《生活周刊》成为国内媒体抗日救国的一面旗帜。1932年7月，他组织成立的生活书店，团结了一大批进步的作者，出版了大量的进步刊物。陶行知在工作中早就结识了邹韬奋，两人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陶行知闻知邹韬奋的死讯后，备受打击，特写挽歌追悼，他说："坚信韬奋播下的种子定能长成，点燃的火把定能燎原，铸成民主中国，创造自由世界。"

除了与民主人士交好，陶行知也是最接近共产党的教育家之一。1944年1月5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董必武过六十岁生日，陶行知还专门作诗祝贺："团结标志一老翁，诲人不倦学不厌。"

1944年10月，中共陕甘宁边区政府和边区文协联合召开陕甘宁边区文化教育大会，总结整风运动和生产运动以来文教工作的经验，表扬了各条战线群众创造的文教工作的典型，并明确了继续发展文教工作的方针，提出了今后五年至七年内文教工作的目标。

10月30日，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的讲话，阐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运动中的统一战线方针。毛泽东在讲话中作了三点强调：第一，明确指出文教工作在整个革命事业中的地位和作用。第二，阐明统一战线的重要性。第三，强调为人民服务，群众路线的重要性。

毛泽东在《文化工作中的统一战线》中说："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战争，其次是生产，然后是文化。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解放

区的文化已经有了它的进步的方面，但是还有它的落后的方面”，“我们必须告诉群众，自己起来同自己的文盲、迷信和不卫生的习惯作斗争。为了进行这个斗争，不能不有广泛的统一的战线。而在陕甘宁边区这样人口稀少、交通不便、原有文化水平很低的地方，加上战争期间，这种统一战线就尤其要广泛”，“我们的任务是联合一切可用的旧知识分子、旧艺人、旧医生，而帮助、感化和改造他们。为了改造，先要团结”。

当得知陕甘宁边区政府文教大会决议和毛泽东在会上的讲话后，陶行知立即响应，在重庆也组织开展了群众文教运动。

和民主人士及共产党人的长期接触，使陶行知意识到建立民主共和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大势所趋，他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全力投入到民主政治和民主教育事业中，决心既要打通层层叠叠的横阶级，也要打通深沟竖垒的纵阶级，他为此提出“中国将来是非民主不可的，中国的教育也是非民主不可的”。

长期的教育实践及理论研究，使陶行知越来越感到旧的教育实践和理论是不可能为人民创造幸福的，因此不仅要提倡新教育，还要建立新的教育理论，要教民众做主人，而不是教人吃别人。

1944 年 10 月 13 日，陶行知致信校务会议说：“校务会议是民主教育之组织，希望列席者不是为会议而会议，而是为民主的学习而会议。一切提案宜有整齐形式，兼提出理由及具体办法。我们要创造的民主，民主的创造，我们不要庸

俗的、形式的、空谈的民主，也不要太看重个人的、英雄的、少数人的创造。一方面，我们要用创造的生活来充实民主的内容；另一方面，要用民主来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

陶行知主张学生要通过自治学习民主，认为学生自治是学生自己组织大家学习、自己管理自己的手段，能养成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有自己立法、执法、司法的意愿。一方面我们要用创造的生活来充实民主的内容，另一方面又要用民主来解放大多数人的创造力，把创造力发挥到最高峰。这样，陶行知的教育理论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



历经千难万险，1944 年 7 月，育才学校终于迎来了建校五周年的纪念日。陶行知特地撰写了题为《从五周年看五十周年》的文章，他写道：

“育才在千灾万难中居然活了五年，可以算是一个奇迹，纪念这个奇迹的最好方式，是爱护它，发展它，使它在新中国和新世界之创造中，发挥它的力量与贡献。”为此，他提出：“让我们克服自己的弱点，抱着我们优良的传统前进吧”，“远征的战士，首先要有勇气对自己的弱点开刀”，“什么是育才的优良传统？第一，奉头脑作司令……指挥我们追求真理，贯通真理，为真理作战。第二，止于大众之幸

福……一切所教所学所做所探讨，为的都是大众的幸福。第三，全校团结成一个巨人。我们需要保持团结的优良传统，需要更坚固更自觉的团结，以保证进一步的创造之成功。第四，虚心学习。这四个字，在文字上是我们的优良传统，在实际上是我们的最大弱点。'骄'字是阻碍我们进步的最大敌人。我们要虚心地跟一切人学，跟先生学，跟大众学，跟小孩学，跟朋友学，也跟敌人学，跟大自然学，也跟大社会学，要学得专，也学得博。第五，建立起健康之堡垒。这身体不属于自己，我们的生活是为整个民族乃至新人类所有……每一个人要爱惜他的身体"。他还特别指出："大时代已经到来，我们除了特修课要继续探讨外，应该要加强几样大的学问，以应大时代之需要。第一，在战时，每一个学校应该不只是一个学问的组织，而是一个战斗体；第二，在平时，尤其是在战时，每一个学校应该不只是一个消费的组织，而且是一个生产体；第三，学习科学，帮助创造科学的新中国；第四，学习民主，帮助创造民主的新中国。"

从这以后，陶行知为生活教育运动制定了"民主的"、"大众的"、"科学的"、"创造的"四大方针，并在育才学校开展施行。

国内抗日局势的不断变化，对陶行知产生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他的教育理论的变化。1945 年 5 月，陶行知在《战时教育》上发表《实施民主教育提纲》一文，系统阐明了民主教育思想。对于民主教育，他提出的提纲是：

（1）旧民主与新民主。旧民主，是少数资产阶级做主，为少数人服务。新民主，是人民大众做主，为人民大众

服务。

（2）创造的民主与庸俗的民主。庸俗的民主是形式主义、平均主义，只是在形式上做到如投票等。创造的民主是动员全体人员的创造力，使每个人的创造力都得到均等的机会，充分的发挥，并且发挥到最高峰。

（3）民主运用到教育方面来。这有双重意义：第一，民主的教育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教育。第二，民主的教育必须做到各尽所能，各学所需，各教所知。

（4）教育的对象或教育的目的。总结起来就是机会均等：入学时求学的机会均等，长进的机会均等，离校时复学的机会均等，失学时补习机会均等，而且老百姓有办学管教育的机会。

（5）民主教育的方法。民主的教育方法，要使学生主动，而且要启发学生使其自觉，要客观，要科学，不限于一种，要多种多样，因材施教，要让生活与教育联系起来。这需要六大解放：解放眼睛，解放双手，解放头脑，解放嘴，解放空间，解放时间。

（6）民主的教师。民主的教师必须要有：虚心、宽容、与学生共甘苦、跟民众学习、跟小孩子学习；消极方面：肃清形式、先生架子、师生的严格界限。

（7）民主教育的教材。民主教育的教材应从丰富中求精华，教科书以外求课外的东西，并且要从学校以外到大自然、大社会中求得活的教材。

（8）民主教育的课程。民主教育的课程包括课程组织等内容。

(9) 民主教育的学制。民主教育的学制，包含小学、中学和大学等学制。

(10) 民主教育的行政。要鼓励人民办学校；鼓励学生自己管自己的事；肃清官僚习气，以及资格的作用等。

(11) 民主的民众教育。家庭、店铺、茶馆、轮船码头，都是课堂。

(12) 民主教育的文字。主张汉字、新文字、注音字母三管齐下，做到多样的统一。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1945年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枚原子弹，三天后又在长崎投下第二枚原子弹。此后第三天，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越来越多的人相信，抗战胜利的日子一天天地在接近。这个时候，国民党军队却在美军空运、海运的帮助下，迅速占领各大城市，接受日本投降。共产党军队则接收经营许久的中小城市、乡村地区。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

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长达八年的中华民族伟大的抗日战争以中国的最后胜利而结束。

陶行知得知抗战胜利的消息后，喜极而泣。他于8月20日在《新华日报》上连续发表《胜利进行曲》和《民主进行曲》两首歌词，表达内心的喜悦："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拿我们的生命，争取我们新的自由。民主团结，到了最紧要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大的吼声……我们万众一心，要做中国的主人"。

抗日战争胜利，接下来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避免内战，民主建国。陶行知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奋不顾身地投入到反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他加入了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接连发表《民主教育》、《民主教育之普及》等文章，并负责主编《民主教育》和《民主》期刊。

这个时候的蒋介石及其控制下的国民党占据绝对优势，所以他仍未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意图，但蒋介石对全面内战也有顾忌：一是全国人民普遍期待和平建国，包括中国民主同盟的民主党派甚至国民党内部均有人反对战争；二是国民党政府的精锐军队基本上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战还需要有一段时间。权衡利弊之后，蒋介石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亦发动和平攻势，于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

连续三次电邀共产党领袖毛泽东到重庆谈判。

蒋介石在8月14日的电报中写道：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中共中央随后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派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为代表，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8月28日，毛泽东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乘专机赴重庆与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

重庆谈判期间，陶行知作为人民团体的代表，多次受到毛泽东的接见。他与毛泽东谈话回来后，常常对周围的人说："听了真开窍。"毛泽东返回延安时，陶行知还带育才学校的师生到机场欢送，并在机场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毛泽东对陶行知也很是赞赏，离开时对他说："将来的教育要靠你，教育部就要你来做啊！"

期间还发生了一件趣事。10月6日，陶行知在听到一位农村老太"民主是不是老百姓自己做老板"的问题后，他写诗《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大公司》来作了回答。他在诗

中说："……中国好比一个大公司，老百姓都是老板，大人是大老板，小孩是小老板，妇女是女老板。……文武百官是伙计，大官是大伙计，小官是小伙计，女官是女伙计。……要想事事如意，人人如意，伙计要忠实，伙计要和气，伙计要努力。还要四万万五千万老板，坐上第一把交椅。……工厂还是工厂，情形大不相同，从前工人是奴隶，现在都是主人翁。你来我去拉拉手，工人歌声遍西东。只要自己不懒惰，海阔天空路路通！"他用形象的比喻，描绘出了民主新中国的美好前景。

经过40多天艰苦而复杂的谈判，国共双方正式签署会谈纪要。因为是10月10日签订，纪要又称《双十协定》。国共双方都承认"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同意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双十协定》签订后，陶行知又组织育才学校的师生，参加庆祝活动，来歌颂伟大的和平建国的开始。

但是，国共两党签订的《双十协定》墨迹未干，国民党便背信弃义，向华北、东北、华东、华中各解放区发动进攻。为此，11月5日，中共中央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11月25日晚，昆明几所大学的学生自治会在西南联合大学举行时事晚会的时候，遭到国民党军队冲锋枪、机关枪的恐吓。次日，昆明三万学生为反对内战和抗议军警暴行宣布总罢课，提出立即停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保障人民民主权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等口号。学生组织了100多个宣传队上街宣传，却遭到国民党特务的殴打和追捕，许多学生受伤。

12 月 1 日，大批国民党特务和军人分批围攻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等校，毒打学生和教师，并向学生集中的地方投掷手榴弹，炸死西南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南菁中学青年教师于再 4 人，重伤 29 人，轻伤 30 多人，造成了震惊全国的“一二·一惨案”。“一二·一惨案”发生后，昆明 3 万多师生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从 12 月 2 日起，昆明为四烈士举行公祭。一个半月中，参加公祭的各界人士有 15 万人，近 700 个团体。全国各地学生纷纷举行集会游行，声援昆明学生的正义斗争。

12 月 9 日，重庆各界人民团体在长安寺公祭“一二·一惨案”的烈士，陶行知带领育才学校学生参加。陶行知亲自写祭文和挽诗，他写道：“是谁杀中国人？是中国自己的‘好汉’；是哪来的枪？是从友邦来的枪。……一起来制止这悲惨的内战。”参加追悼会前，陶行知甚至做好了牺牲的准备，他给自己的妻子写下遗书：“我现在拿着昨晚编好的诗歌全集去交给冯亦代先生出版，然后再到长安寺去祭昆明反内战被害烈士。也许我们不能再见面。这样的去是不会有痛苦，希望你不要悲伤。你有决心，有虚心，有热心，望你参加普及教育运动，完成四万万五千人之启蒙大事以奠定天下为公之基础，再给我一个报告。”在育才学校的朝会上，陶行知在宣布自己要去参加公祭的消息后，又慢慢地说：“我于昨天一晚，已把我的破布烂棉花的诗稿整理好……我是可以交代了，无顾虑地去参加祭礼了……参加是危险的！只要有正义感有爱国热忱的人都应当去参加。我是校长，我不强迫大家去参加，也不阻止大家去参加，可以自

愿地去参加。”参加完公祭后，他在给妻子的信中称“预备死而不死”，并说，“今后尚有为民族人类服务之机会而又能与你再见，真是幸福。我当加倍努力，以无负于此幸福也”。



12月22日，陶行知与好友李公朴等人支持重庆进步的职业青年提出的利用夜间空时学习的要求，开始筹备社会大学。陶行知提出由青年人“自己来发起，自己来筹款，自己选校董，自己选校长”的办法，由他和冯玉祥、张澜、沈钧儒、李公朴等人为校董，冯玉祥为校长，并从学员中选择了金秀堤、周西平等人为工作人员。

1946年1月，陶行知发表长诗《社会大学颂》，后又著《社会大学运动》一文，阐明社会大学运动的意义和内容。陶行知在《社会大学运动》中说：

“社会大学有两种：一是有形的社会大学；二是无形的

社会大学。社会大学运动是要把有形的社会大学普及出去，并且要给无形的社会大学一个正式的承认，使每一个人都承认这无形的社会大学之存在，随时随地地进行学习。

无形的社会大学，是只有社会而没有‘大学’之名。它是以青天为顶，大地为底，二十八宿为围墙，人类都是同学，依“会的教人，不会的跟人学”之原则说来，人类都是先生，而且都是学生。新世界之创造，是我们的主要的功课。无形的社会大学，虽无社会大学之名，但它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最伟大的大学，最自由的大学，最合乎穷人需要的大学。我们穷人一无所有，有则只有这样一个社会大学，这无形的社会大学既然是我们的，我们就应该承认它，认识它，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宝贝，运用它来教育我们自己，使自己和同伴近邻养成好学的习惯，活到老，学到老，进步到老。把这个思想装进每一个人的心里，是社会大学运动的第一个任务。

有形的社会大学是夜大学、早晨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电播大学……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亲近老百姓。我们认为亲民的道理，比新民的道理来得亲切。我们要钻进老百姓的队伍里去和老百姓亲近，变成老百姓的亲人，并且要做到让老百姓承认我们的确是他们的亲人。

社会大学之道，是要为人民造幸福。一切学问，都要努力向着人民的幸福瞄准。所谓人民的幸福，用老百姓自己的话说便是福禄寿喜。照着人民所愿望的福禄寿喜四大幸福进行，我们的学习才于人民有益，才配称为社会大学。也只有社会大学与人民幸福打成一片，而后社会大学运动才能成为

人民应该参加的富有意义的大运动。”

1月15号，在众人的努力下，重庆社会大学正式开学。陶行知任校长，李公朴任副校长兼教务长。校址设在管家巷二十八号，学生一百名，分设政治经济系、文学系、新闻系、教育系，另有专题讲座。陶行知在社会大学的开学典礼上作了演讲，阐述了社会大学的办学宗旨、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发展计划等。陶行知指出，社会大学的宗旨是“人民创造大社会，社会变成大学堂”、“大学之道，在明民德，在亲民，在止于人民之幸福”，此举有力地推动了民主教育的进程。

在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怀和大力支持下，陶行知和李公朴先后邀请翦伯赞、许涤新、华岗、邓初民、王昆仑、罗克汀、何思敬、章乃器、马寅初、侯外庐、何其芳、刘白羽、聂绀弩、孙铭勋等大批学者专家来学校讲课。

社会大学开学不久，国民党教育部百般刁难。陶行知针对教育部提出的社会大学“设备简陋”一说，针锋相对地说：“说‘简’则有之，我们承认。只有简，才容易行。特别是在中国，不需要一些东西，如洋房、基金、立案之类的阻挠，要新的大学之道。说我们‘陋’则不同意。《陋室铭》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我们社大有热心的教授，有好学的青年，有新的大学之道，‘君子办之，何陋之有’？”最终，社会大学冲破国民党反动派的重重压迫，坚持办学一年零两个月，前后招生两期，共300多名学生。

按照《双十协定》，国共两党需要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对国民大会及其他问题进行商讨后再作决定，并制定新

宪法。1946年元旦，国民政府主席发布公告，呼吁双方举行会议以政治方式解决争端，维护国家统一，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召开拉开了序幕。

1月6日，国民政府成立秘书处，并公布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七条办法及全体会员名单。1月7日下午，政协预备会议（茶话会）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室举行。1月10日，政协大会正式开幕。

历时22天的政协会议，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各民主党派的合作与斗争，终于迫使蒋介石签订了《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关于宪法草案问题的协议》、《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共五项协议。这些协议否定了国民党的反人民的内战政策，迫使国民党承认党派存在的合法性和各党派的平等地位，确定了民主改革的总方向，会议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在政治协商会议开幕之后，陶行知在《新年的希望》一诗中提出停止内战，军队交给联合政府，"一党专政快取消，由下而上的各级政府都该是联合政府来为老百姓造福"的主张。他还与李公朴等人组织民主协进会，在沧白堂等处举办民主讲座，定期要求政协代表作报告，让育才学校师生都听取这些报告。国民党特务得知消息后，多次来骚扰会场，并公然向主席台扔石头，打伤了很多人。陶行知组织育才学校的师生们积极保护演讲的民主人士，还作了《大闹沧白堂有感》的诗，他写道："主人要讲话，公仆摔石头。纵然被打死，死也争自由。"

政协会议成功召开后，重庆各界人士在较场口集会庆

祝。陶行知组织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师生担负宣传和纠察工作。他说："政协会议已经闭幕，《双十协定》也早已签字，但纸上的东西，还要我们用行动去争取才能实现，我们还要广泛宣传发动群众。"他还说："我今天去开会是准备挨打，甚至是流血的。希望参加大会的师生也要作好思想准备，要勇敢，镇定，团结一致。"



当参加庆祝的群众团体陆续进人会场时，由中统特务组织秘密拼凑的另外一个所谓“主席团”成员吴人初（重庆市工会理事长）、刘野樵（重庆市农会常务理事）、周德侯（重庆市商会理事）等登上了主席台。会场两侧布满了特务和打手。周德侯叫嚷要刘野樵当执行主席，并悍然宣布开会。李公朴、施复亮上前阻拦遭到毒打。郭沫若、陶行知、章乃器、马寅初等和新闻记者及劳协会员60余人也被打伤。这就是震惊国内的“较场口血案”。正当暴徒、特务行凶的时候，周恩来、冯玉祥等赶到，于是特务和暴徒四散而去。当晚，周恩来等四位代表向蒋介石当面交涉，并带去沈钧

儒、梁漱溟等人联名写给蒋介石的抗议信。陶行知去医院看望伤员，从医院返回育才学校的时候，他对学生们说："大家要沉住气！要知道民主是需要用鲜血、用生命去争取的！"

事后，国民党反而进行诬陷，荒谬地指责是陶行知指使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学生捣乱会场，并扬言要逮捕审讯他。陶行知表示："随他们的便，打骂吓不倒我们，法庭更不可怕！我们多经历一次风雨也是多受一次锻炼嘛！"当时，民主人士得到这个消息，举国舆论一片反对声，国民党当局迫于舆论压力最终没敢抓捕陶行知！

到了4月，延安派代表到重庆来慰问"较场口血案"的受伤人员。陶行知前去迎接，并和王若飞、沈钧儒、郭沫若等代表畅谈争取民主团结的斗争形势和当前的任务。

4月8日，王若飞携带中共代表团就宪法、国民政府组成等问题同国民党谈判，之后同秦邦宪、叶挺、邓发和黄齐生等，乘飞机离开重庆返回延安，准备向中共中央请示汇报。因天气原因，能见度很低，飞机中途迷失方向，不幸在山西省兴县黑茶山上撞山坠毁，同机13人全部遇难，王若飞时年仅50岁。

陶行知得知此消息后，非常难过，他发表《敬挽'四八'殉难烈士》、《'四八'殉难烈士诔词》、《挽晓庄小朋友》等诗文，表达了对他们的哀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陶行知已成为国民党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他创办的社会大学开办仅仅一年多，就被国民党政府当局封闭，育才学校也有被封的危险。为了育才学校

和重庆社会大学的将来，陶行知决定到上海选择新校址。

4月初，陶行知将要离开重庆，妻子问他什么时候去延安。他回答说："我现在去不了，如果我生前去不了，那么在死后要埋我时，将头朝向北方（延安的方向）。"在随后和翦伯赞的谈话中，他又说："我这次到上海去，主要是做上海的工作。我想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函授大学、新闻大学、无线电大学，让整个上海都变成学校，让上海五百万市民都能得到教育和再教育的机会。这样，我的生活教育的理想就全部实现了。"

4月11日，陶行知从重庆到达南京，重访晓庄。陶行知的到来得到了胡同炳等原晓庄师范学校老师和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去晓庄的途中，当地农民和儿童到中央门附近放鞭炮迎接。陶行知终于回到他阔别16年的地方，这个地方是他的梦开始的地方，晓庄这个地方，承载着他太多的梦想与回忆。16年过去了，晓庄早已经物是人非，陶行知也由一个怀揣梦想的奋发青年变成了年过半百的爱国人士，他站在晓庄的土地上，良久不语。陪同他的胡同炳希望他能够恢复晓庄师范学校。

胡同炳是陶行知在晓庄师范学校较早培育的学生。1936年陶行知出国为宣传抗日救国到处奔波的时候，胡同炳得了脊椎炎。家里为了给他治病，变卖了全部家当，但胡同炳的病不但没有好转，反而一天比一天沉重了。

正当全家为胡同炳的病情担忧时，陶行知的信到了胡同炳的手中。原来，陶行知在国外从一个晓庄师范学校学生的来信中，知道了胡同炳的病情。他给中山医院熟悉的医生去

了信，让胡同炳赶快到上海中山医院骨科治病。胡同炳前后在医院住了两年，都得到了医院很好的照料。这期间，陶行知还委托在上海的学生经常代他去医院探望胡同炳，不断送去各种生活用品，还写信鼓励他同疾病进行斗争。胡同炳说："陶行知就是我的再生父亲。"

听了胡同炳的话，陶行知说："晓庄师范学校是要办的，但现在还不能，因为有人要打内战。等将来，我们不但要办晓庄师范学校，还要办晓庄研究院。"

离开晓庄之后，陶行知又祭扫了家人的坟墓，随后匆匆赶往上海，一到上海，他立即投入到反独裁、争民主、反内战、争和平的斗争中。他在工厂、学校、机关、广场发表演讲100余次，宣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主张。他在给翦伯赞的信中说："上海的青年希望民主，和重庆没有两样，可是他们遭受的压迫，和重庆的青年也没有两样。"

4月21日，到上海市育才中学进行演讲的陶行知，受到上海市1000多名教师的热烈欢迎，到了育才中学，他作了题为《民主生活与民主教育》的演讲。25日，上海市教育团体联合会又在储能中学召开欢迎会，请陶行知进行演讲。此后，又有多个学校、进步团体和协会纷纷邀请陶行知进行演讲，有时候陶行知不得不一天进行三次演讲。陶行知在演讲中，多次提出反内战、反独裁、争取民主和平主张，得到了上海人民的热烈欢迎和响应。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份已由人民教育家转变为民主战士的陶行知和共产党也越走越近。四月末，中共上海市郊工委委员马崇儒根据组织指示与陶行知联系，陶行知对马崇儒

说："我办学跟别人不同，别人喜欢在城市里办学，我却偏偏喜欢到乡村办学……中国大，农民多，农民种粮食给我们吃，农民懂得的事比我们多，但中国的农民生活也最苦……我们应当到农村去办学，去拜农民为师，与农民同患难共命运，去给他们文化。"他还重新解释了自己在很多年前提出的"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学团的意义，他说："工以养生就是要教会学生做工种田，学以明生就是要教会他们懂得做人的道理和求生存的方法，不只是识几个字，更重要的是懂得做主人。团以保生就是要让他们团结起来，打倒一切反动派。"



1946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陶行知参加了上海市百货业职工的联欢活动，又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讲，鼓励广大工人阶级追求民主自由。在随后的几天里，在陶行知指导下，张文郁、李楚材和上海中教联的领导成员段力佩等积极筹建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成立后，陶行知在成立大会上发表《生活教育创造史》的演讲，积极发展社员。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先后举办讲座，开展民主运动，研究民主教育，许多社会人士纷纷参加，社员人数很快就突破了两百人。为了募集办学经费，陶行知给冯玉祥、郭沫若、田汉等写对联和条幅进行义卖，甚至在《时事新报》

上刊出他们联名卖字兴学的广告。

而陶行知在上海筹办社会大学的运动因为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挠而最终没有成功，他只好借助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来举办不定期的专题讲座。生活教育社上海分社借储能中学、大任小学等学校的校舍作为会场，先后邀请郭沫若、吴晗、黄炎培等知名学者来做专题演讲，吸收社员。许多教师和社会青年常来听课。

这之后，陶行知决定举办“生活教育社社员暑期进修班”，将其作为上社会大学的另一个形式。他亲自草拟了30个讲课老师的名单交给段力佩，并对张文郁说：“今天，教育者的第一任务在促进民主，扩大教育影响就是扩大民主运动的影响！生活教育的发展应该归结为民主教育。”

在儿童节到来之际，陶行知在刊物《小学教师》上发表《小学教师与民主运动》的文章，提出：“我们要为民主奋斗，我们得加强自己，改变自己，武装自己，而且要为教育招兵，为民主募马。”文章直接指出中国长期以来是封建专制教育、法西斯教育，因此，他提出对小学教师的五点意见：现在首先是“我们自己需要再教育，再受民主教育……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要学习的东西很多，但最主要的是不能忘了社会科学”。在谈到教师的再教育时，他说：“我要介绍最伟大的老师，一位就是老百姓，要学习人民的语言、感情、美德，努力发现他们的问题、困苦、希望。另一位就是小孩子——我们所教的小学生，不愿向小孩子学习的人，不配做小孩子的先生。一个人如果不懂小孩子的心理、问题、困难、愿望、脾气，如何能教小孩？

如何能知道小孩子的力量？其次，运用民主作风教学生，并与同事共同过民主生活，以造成民主的学校。再次，要教学生为民主的小先生，为社会服务……人生以服务为目的，不是毕业后才服务。再再次，要教民众自己成为民主的斗士，乃至成为民主的干部，大家起来创造一个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最后，争取民主以保障生存权与教学自由。”他在文章的最后写道：“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学生的职务是‘千学万学，学做真人’。”这五点意见，既是对小学教师的指引，更是对民主战士的要求。

6月8日，陶行知和上海文化界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沙千里、茅盾、巴金、章乃器、胡绳、徐伯听、胡风等164人联名上书蒋介石，呼吁停止内战。

6月14日，陶行知又和即将离开上海回到解放区的共产党教育工作者柳湜见了面，听了柳湜介绍解放区的教育工作——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情况，十分兴奋。在谈到生活教育理论的时候，陶行知说道：“我的生活教育的思想，大半都是从资产阶级、大地主，以及老百姓中的启发而来的，自然，我的思想不是抄他们的，他们有的只启发我想到某一面，有的我把它反过来，就变成了真理。有的是不能想象出来的，是要群众动手才能看到，动手最重要。……我一生只想多做些事，现在要做的事又太多了，我不仅没有时间写一本书，就是连短文章也没有时间写，所以除了演讲外，就是作诗。说话不用准备，作诗则更经济，至于对学术采取一种严肃态度，那是应该的。我常说，还是多做些事。如果你不幸死得早，如果你真有些思想，会有人替你整理出

来的。"

6 月 19 日，陶行知接受邀请，为春风文艺社题词，他写道："为大众写，为小孩写，转进大众小孩的队伍里去……共患难，同喜悦，向大众小孩学习……要做到：一闻牛粪诗百篇，风花雪月都变节。"

仅隔一天，陶行知又来到大同大学，参加大同大学召开的反内战和平大会。在这个大会上，还有与陶行知一同应邀前往演讲的吴晗。两人正准备演讲，谁知国民党特务切断了会场上的扩音器电源。陶行知看见这状况，并没有屈服，他用最大的声音，大声发表演讲，极大地振奋了会场的气氛，博得全场师生的热烈掌声，更打击了反动者的气焰。

6 月 23 日，上海市十万群众在火车站广场召开群众大会，欢送马叙伦等代表赴南京请愿。陶行知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甚至牺牲的准备，毅然决然地站在欢送人群中发表短暂的演讲。他大声疾呼："我们要永久的和平！假装的民主太丑了，我们需要真正的民主！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制止内战，争取永久的和平！我们要用人民的力量，反对独裁，争取真正的民主！"陶行知的演讲得到数万群众的强烈反应，大家纷纷呼喊口号。这时，隐藏在人流中的特务也开始晃动，陶行知身旁有人提醒他，让他加倍提防，防止"较场口血案"重演。陶行知说："重演不重演是政府的事，你来参加，难道不是准备挨打的吗？"



经过长达八小时的艰难旅程，请愿代表所乘坐的列车终于到达南京下关车站。代表团刚一下车，就有三个自称是“苏北难民”的国民党特务挤到代表们身边来，要代表们说明此行的目的，发表对时局的意见。代表团秘书胡子婴答复道：此行的目的无非是要向政府当局和中共呼吁停战，达到全面永久和平。

忽然有人鸣笛，又有一群自称“难民”的暴徒蜂拥而至，骂声四起，现场一片混乱，他们把代表们团团包围起来，而两旁站立着的军警居然熟视无睹。在混乱中，代表团被有计划地分割成两部分：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陈立

复被推推拉拉，进了候车室；盛丕华、蒉延芳、吴耀宗、阎宝航等则被挤进了西餐厅。

到晚上 11 点多，也就是代表们被围困五个多小时后，候车室门口只剩下一个宪兵和一个警察，而围在外面伺机行凶的“难民”却有一两百人。突然，“难民”堆里的一个人敲破了窗户钻进了候车室，于是，大批“难民”一拥而入，这些“难民”看见请愿代表就打。结果，请愿代表中马叙伦、雷洁琼、陈震中等代表被打伤，前往采访的《文汇报》、《大公报》记者也遭到无辜的毒打。这就是震惊一时的“下关惨案”。当晚 12 点，经过中共代表和民主人士紧急呼吁之后，南京有关当局才将受伤人员送往医院。

“下关惨案”发生的消息传到上海后，全市各界人民群情激愤。民主人士刘晓立提出要迅速行动起来，对国民党的暴行表示严重抗议，要求惩办凶手。陶行知以全国和平联合会暨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名义，招待在沪的各国记者。陶行知直接用英语向各国记者揭露了“下关惨案”的真相，并散发了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的书面抗议书。陶行知的发言，直接揭露了国民党的丑恶罪行，使得世界各大报纸纷纷报道。随后，《大美晚报》和《字林西报》等媒体，在头版新闻中也详细报道了“下关惨案”的详情。

开完发布会后，陶行知又指导上海中等教育研究会在《文汇报》上开设《教育阵地》的副刊。他发表名为《走向殖民地》的文章，指出中国沦落到殖民地是“因为反民主好战分子想借外援，以取得在内战中之优势，所以根本救国之道，还是要停止内战，实现民主。只有永远停止内战，真

正实现民主，才能免于殖民地之厄运”。

1946年7月初，陶行知又作了题为《中国之新教育》的演讲，提出五项修养：为博爱而学习，为独立而学习，为民主而学习，为和平而学习，为科学创造而学习。他在为民主教育和民主中国继续努力着。这个时候，仍有许多解放区的共产党人来信或者来访，而陶行知均积极接待，并对解放区充满了向往。曾经访问过延安的美国记者罗尔泊、奥地利医生詹生与他谈话的时候，他发感慨道：“非常遗憾，我直到今天还没有到过解放区。”

然而，包括陶行知在内的社会各界爱国人士的不断努力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国民党于7月公然撕毁《停战协议》和《政协决议》，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李公朴、闻一多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昆明民主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他们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多次公开呼吁结束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提出建立联合政府与和平民主建国的合理主张，因此被国民党特务列入黑名单。

1946年7月11日晚，李公朴和夫人外出，大概晚上10点路经青云街学院坡时，被保密局昆明站特别行动组特务用无声手枪击伤，子弹由后腰射入腹部穿出。李公朴因失血过多于次日凌晨逝世，这个伟大的民主斗士在最后一刻还大骂“无耻”，高呼“我为民主而死”，让无数人为之动容。

7月15日，闻一多到云南大学致公堂参加李公朴死难经过报告会，一出家门便被国民党特务跟踪。在报告会上，闻一多愤怒地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作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讲演》报告。下午，他又去报社举行记者招待

会，表明了反独裁、反内战的严正态度。会后，他与长子闻立鹤返回西南联大西仓坡宿舍，就在离家门不远的地方，被尾随而来的第二组特工用美式冲锋枪扫射，闻一多身中八枪不幸当场殉难。

“李闻惨案”噩耗传来，全国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士都义愤填膺，严厉谴责国民党的暴行。甚至，美国哈佛、哥伦比亚、纽约等大学的知名教授都对国民党政府发出严重抗议。

陶行知和上海的爱国民主人士也为两位斗士举行了悼念活动。陶行知在悼念李公朴的挽诗中写道：“你争取民主，反对一党专政。你争取和平，反对中国人杀中国人。杀你的人是杀民主，杀和平，杀害中华民族的生存。这一颗凶恶的子弹不是打你一个人，是打在四万万五千万人的心身。”得知闻一多被害，他气愤地对加拿大朋友说：“国民党专横毒霸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们拥有全国的军队与警察，然而他们还要像蛇蝎一样地向上爬，去盗窃那些进步的手无寸铁的民主人士的生命。”他在《追思李公朴先生》诗中写道：“只要看一看，杀你的子弹是从哪儿来的，便知道谁发动这个自相残杀的战争。”

1946 年 7 月 15 日，有朋友打听到消息，告诉陶行知：“你是第三枪，已经被国民党特务列为黑名单上的第三名，随时可能被杀。”就连郭沫若和翦伯赞也劝他多加提防，然而陶行知却大义凛然道：“我等着第三枪！”

第二天，他给育才学校的师生写信道：“如果消息确实，我会很快结束我的生命，深信我生命的结束，不会是育

才和社会教育社之结束，我提议，为民主死了一个，就要加紧感召一万个来顶补。……平时要以‘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达者不恋’的精神来培养学生和我们自己，有事则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美人不能动’相勉励。”



1946 年 7 月 16 日，陶行知在给育才同学会上海分会的信中说：“现在民主斗争已经到了最尖锐的阶段，反民主分子不惜用恐怖手段来抵抗那不可抵抗的大势。只要我们肯为民主而死，真民主就会来到，而中华民族也一定可以活到万万年。”

之后，陶行知原借住在胜利饭店友人的住处，被宪兵搜查与特务监视，又借住另一友人住处避难，仍遭监视。自知身处危境，陶行知依然加倍努力地工作，日夜赶写对联，整理书稿，还清理卖字兴学的欠账。

7 月 24 日，陶行知与郭沫若等 30 余人致电美国哥伦比

亚大学历史学院，请派代表调查中国民主运动领袖李公朴、闻一多惨遭特务暗杀事件。当晚，陶行知又彻夜整理他心爱的诗稿。

7月25日，因长期劳累过度、健康过损，加之受好友李、闻事件的刺激又过深，陶行知突发脑溢血，不得不住进医院。周恩来、邓颖超、沈钧儒等闻讯前往探视。7月25日12时30分，因抢救无效，一代教育家陶行知不幸逝世。周恩来、邓颖超闻讯立即赶到医院，周恩来俯身拉着陶行知还不十分僵硬的手，含着热泪说："陶先生放心去吧！您已经对得起民族，对得起人民，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坚持下去的。你放心去吧！"

陶行知不幸逝世的噩耗传来，整个社会哀思如潮。晓庄师范学校、山海工学团、育才学校的师生和全国各界爱国民主进步人士、海外侨胞、国际学者都非常悲痛，纷纷开展追悼活动。

7月26日，各界人士为这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上海殡仪馆举行大殓，由沈钧儒主持祭奠仪式，郭沫若、许广平、黄炎培、马叙伦、茅盾等友人参加追悼活动，人们纷纷写挽联表达对陶行知的无限哀思：

面对如此世界，正需大家全力撑持，奈何舍我侪遽去；

遗下许多事业，皆是吾公一手创造，最难安后死仔肩。

——沈钧儒挽陶行知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
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郭沫若挽陶行知

死生以之，为中华民主奋斗；
知行合一，是先生教育精神。
——黄炎培挽陶行知

之后各界追忆陶行知的活动不断：

8月4日，生活教育社、育才学校和社会大学全体师生在重庆管家巷二十八号举行陶行知校长追悼会，参会者千余人。史良的挽联写道："教育与民主不可分，遍栽桃李万千，遗志克承，先生无恨；专制和法西斯成气，纵有妖魔一二，和平争取，我辈有人。"吴玉章的挽联写道："四日杀二贤，人人愤激，愤激夺去了我公生命；殃民复祸国，个个怒吼，怒吼起来了大地光明。"

8月11日，延安各界代表举行陶行知先生追悼大会。毛泽东同志致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主祭人为林伯渠、陆定一、徐特立，林伯渠代表边区政府讲话，陆定一代表中共中央致悼词，赞誉他："一生致力于救国事业、民主事业与教育事业……先生之死，对于中国民主运动与教育运动，是不可补偿的损失……陶先生的这种教育思想，正是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人民服务的教育思想。"

8月16日，育才学校在古圣寺召开追悼会。

9月23日，重庆各界追悼陶行知大会在沧白堂举行。陆定一挽联写道：“有利国家生与死，不因祸福趋避之。”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挽联写道：“劳山举义旗，教育归还老百姓；蜀土成遗爱，乡人喜见小先生。”许德珩挽联写道：“教学做合一，若干年来倡导生活教育，身体力行，论功岂止武第二；智仁勇兼备，胜利前后呼号民主，赴汤蹈火，说死实与李闻为三。”

9月25日，港九各界举行陶行知追悼大会。

10月7日，新加坡各界华侨举行李、闻、陶先生追悼会，参加追悼会的有100多个社团，1000余人。爱国华侨陈嘉庚挽联写道：“君等人地登天，争取民主，争取自由，但凭赤手空拳，洒尽人间血泪；我亦痛心疾首，反对独裁，反对贪污，悉本侨胞公意，只求国跻三强。”

10月27日，上海各界在震旦大学举行祭奠陶行知先生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工人、农民、学生、文化教育界及中外人士5000余人。沈钧儒主祭，田汉读祭文，大会主席陈鹤琴、翦伯赞报告先生生平事迹，郭沫若致悼词。宋庆龄为陶行知先生题词“万世师表”。

12月1日，陶先生灵柩由沪运抵南京劳山安葬，京沪等地远道来迎灵送葬者千余人。南京工人、学生、军人、公务员、教育人士纷纷前往送葬。沈钧儒、董必武、翦伯赞、曹靖华、陈鹤琴等人代表50多个人民团体公祭，送葬队伍3000多人，沿途还有很多农民设案祭拜。公葬典礼上，陈鹤琴宣读祭文，翦伯赞致辞，毛泽东、朱德、吴玉章、冯玉

祥、何香凝以及中国民主同盟等均送了花圈。

在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的墓碑上，镌刻着郭沫若手书的16个字：“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经历了生活的万千磨砺，陶行知终成医治人心的教育巨匠，成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礼记》有言：“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人民服务者，亲民庶几无疵。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教人民进步者，拜人民为老师。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为人民奋斗，血写人民史诗。”陶行知以“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的赤子之忱，解读了他的这首诗：“亲民，民为贵，一切为人民。”陶行知真正地属于人民。

陶行知说：“我的志愿是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他毕生始终不渝地朝这个目标努力，先后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乡村教育运动、普及教育运动、国难教育运动、战时教育运动、民主教育运动等。他通过行动，改革旧教育，建立新教育，以调查为基本依据，以试验为根本方法，充分利用试验作为立新破旧的工具。他批评中国教育依赖天工、沿袭陈法、率任己意、照搬他国、偶尔尝试、凭空构想、一知半解、武断从事，断言：“欲教育之刷新，非实行试验方法不为功”，“非试验的教育方法，不足以达救国之目的也”。陶行知所倡导的试验，正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所缺少的一种思维方式和精神，它能开创新局面，也会遇到大阻力。他认为，注重试验的教学法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养成学生独立思想的能力”，试验教育的目的在于养成会试验的

教育家和会试验的国民。

陶行知去世后，他“爱满天下”的精神深深感染着他的学生和朋友，被世人誉为“万世师表”、“人民导师”，陶行知被安葬在他播下爱的种子的晓庄，这颗爱的种子需要撒到一切需要爱的地方，以酿造出更多的幸福果实供大家分享。

1947 年 3 月 15 日，晓庄师范学校举行 20 周年纪念大会。晓庄校友为永久纪念这位伟大的人民教育家而筹款建立的“行知纪念馆”正式落成开放。

也是在这年的 3 月，郭沫若编校的《行知诗歌集》由大孚出版公司出版。郭沫若在《校后记》中说：“陶先生是开创时代的哲人，是伟大的人民诗人”，“这是一部人民经”，“他会教我们怎样作诗，并怎样做人”。

“中国人民教育旗手，民主运动巨星”、“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将长久地活在人民的心中！

附

陶行知年谱

1891 年，生于徽州歙县西乡黄潭源村；

1904 年，14 岁，入歙县基督教内地会所办的崇一学堂读书；

1910 年，20 岁，靠教会资助入南京金陵大学文科；

1914 年，24 岁，留学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获政治硕士学位；

1917 年，27 岁，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教授等职；

1921 年，31 岁，参与组织中华教育改进社，任总干事；

1923 年，33 岁，发起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总会，后赴各地开办平民学校；

1926 年，36 岁，起草发表了《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

1927 年，37 岁，在南京北郊晓庄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师范学校；

1930 年，40 岁，遭国民党通缉被迫流亡日本；

1931 年，41 岁，回国开展教育普及工作；

1932 年，42 岁，创建山海工学团，提出“工以养生，

学以明生，团以保生”思想；

1935 年，45 岁，与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等发起组织“上海文化界救国会”；

1936 年，46 岁，成立国难教育社，后到国外宣传中国抗日救国主张，募集物资；

1936 年 5 月，他当选为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执委和常委；

1936 年 11 月，联络杜威、爱因斯坦、罗素等世界著名人士联名通电蒋介石，营救“七君子”；

1938 年，48 岁，参加国民参政会，在桂林正式成立生活教育社，当选为理事长；

1939 年，49 岁，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

1941 年，51 岁，参与发起成立中国民主政团同盟；

1945 年，55 岁，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中央常委兼教育委员会主任委员；

1946 年，56 岁，在重庆创办社会大学并任校长；听闻李公朴、闻一多相继被杀，突发脑溢血，猝然离世。